

《春秋》書法與「義」在言外 ——比事見義與《春秋》學史研究

張高評*

〔摘要〕

類比對比相關史事，修飾鏈接相關辭文，如此可以體現《春秋》「推見至隱」之義。孔子作《春秋》，所修者主要為其辭，由事來定辭，藉辭來見事。《春秋》有筆削去取，故據事直書，往往如顧炎武《日知錄》所謂「於敘事中寓論斷」。朱子以為《春秋》「據實直書，具文見意」，知據事憑文，而其義可見。孔子竊取之「義」，在屬辭比事之運用下，其特色為「蓋有言外之意」，但「都不說破」。本文聚焦於屬辭比事，綜考《春秋》學史，提出考求《春秋》書法之法門有三：其一，據比次史事以見義；其二，因連屬辭文而顯義；其三，緣探究終始而示義，所謂「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者是。三者相互為用，可以捨傳求經，足以考求《春秋》之微辭隱義。為篇幅所限，今但舉比事見義，以論證可以「無傳而著」之理。

關鍵詞：《春秋》書法、屬辭比事、敘事見義、言外之「義」、捨傳求經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收稿日期：2014 年 8 月 11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4 年 12 月 29 日

一、前言

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漢董仲舒（179-104B.C.）《春秋繁露·竹林》稱：「《春秋》記天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¹司馬遷（145-86B.C.）《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亦云：「《春秋》推見至隱」，²孔子據魯史記修纂《春秋》，有所筆削去取於其間，以見微言大義之所歸。筆削去取，微言大義，出於孔子之別識心裁，由於旨趣幽微隱晦，孔門高弟多不能贊一詞，他人又如何能索解？北宋程頤（1033-1107）《春秋傳》自序稱：《春秋》大義數十，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³以南宋朱熹（1130-1200）之博學通人，亦屢屢感歎《春秋》難看、難知、難說、不可曉、自難理會，以至於「平生不敢說《春秋》」；⁴朱子以為難，不敢說，其中自有緣故。

《春秋》一書，載事必寓義旨，見義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蓋事外無理，理在事中；而所謂書法，蓋表現「如何書」，且體現「何以書」。孔子作《春秋》，與列國《春秋》有別；其關鍵殊異，即在書法中是否寓乎「道」與「義」：

古者載事之史，皆名《春秋》。載事必有書法，有書法必有是非。以功罪為賞罰者，人主也；以善惡為是非者，史官也。二者未嘗不并行，其來久矣。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盡乎義，故孔子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統紀、存舊章，錄世變也。⁵

「史有書法而未至乎道，書法有是非而不盡乎義」，「道」與「義」之標榜，乃孔

¹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卷2〈竹林第三〉，頁39。

²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0年），卷117〈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頁1232。

³ [宋]程頤、程顥：《二程全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四部備要》本），《伊川經說四·春秋傳序》，頁1。

⁴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83〈春秋綱領〉，頁2149、2153、2154、2156、2157、2165、2175、2176。

⁵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2009年），卷9〈春秋〉，頁117。

子參考魯史記，「修而正之」，持以「示法戒、垂統紀、存舊章，錄世變」之志業。《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故《春秋》書法載道而寓義，其憂時經世之別識心裁，宋胡安國（1074-1138）《春秋傳》稱為「史外傳心之要典」，⁶有書法、寓是非、見道義，故非徒載事而已也。

《春秋》所以難知、難理會，由於亡佚《不脩春秋》，對照無從。⁷因此，趙汭稱：「若有《不脩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亦自顯然易見。」⁸所以兩漢以後多仰賴《三傳》之解說，作為理解《春秋》之階梯。不過，《三傳》釋經，家自為說：《左傳》以歷史敘事說《經》，《公羊》、《穀梁》以義理哲學解《經》，猶《莊子·天下》所謂「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雖然，「皆有所長，時有所用」。⁹故唐韓愈（768-824）作〈寄盧仝〉詩，反映中唐學者解讀《春秋》之法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¹⁰啖助（724-770）、趙匡（?-770-?）等提出廢棄《三傳》，回歸《春秋》原典之解讀方式，影響北宋以來《春秋》學的詮釋進路。¹¹

問題的焦點出現了，試問：廢棄《三傳》，只要獨抱《春秋》經，也可以考察出孔子之筆削去取，破譯《春秋》之微言大義嗎？如果廢棄三傳，獨抱《春秋》

⁶ [宋]胡安國：《春秋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四部叢刊》初編本），卷首〈春秋傳序〉，總頁1。又，〈進《春秋傳》表〉，總頁4。

⁷ 孔子作《春秋》，參考底本為魯史記，即《魯春秋》，《公羊傳》謂之不修《春秋》。列國《春秋》皆記事之書，「爰始要終，本末悉昭」，記事尚詳，為古《春秋》之成法（說本劉師培《左盒集》，卷1〈古春秋記事成法攷〉）。孔子既筆削《魯春秋》，而另成一書，以一萬六千餘言載記二百四十二年事跡，每年平均才65字，每月得5.4字。詳略懸殊如此，其筆削去取可以想見。若有《不脩春秋》傳世，即可作為對照校讎，孔子筆削之大凡，取捨之準則，將不難考見。

⁸ [元]趙汭：《春秋師說》（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清]徐乾學輯：《通志堂經解》本），卷上〈論魯史策書遺法〉，頁8，總頁14921。趙汭：《春秋屬辭》（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通志堂經解》本）：「朱子嘗謂：『惜乎《不脩春秋》不存，不知孰為夫子所筆，孰為夫子所削。』最得書法失傳之由。」卷8〈假筆削以行權第二〉，頁1-2，總頁14801。

⁹ [戰國]莊周著，[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卷10下〈天下第三十三〉，頁1069。

¹⁰ [唐]韓愈：《韓昌黎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收入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7〈寄盧仝〉，頁341。

¹¹ 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3年1月）。

經，成為《春秋》學研究之可能，那麼，開啓學術園林之鎖鑰是什麼？其中之關鍵課題是什麼？解讀之要領與策略又是什麼？筆者以為，《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¹²這就是以經明經，「無傳而著」之核心策略與通關鑰匙。《孟子·離婁下》所云孔子作《春秋》，涉及載事、修辭、取義三者；三者如何合而為一，又如何一分為三？其中之脈注綺交如何？成為解讀《春秋》微言大義之策略。具其事，憑其文，可以求得《春秋》之微辭隱義。解讀《春秋》之義，孟子已具體而微提示若干法門與要領。

自中唐啖、趙提倡棄傳從經，北宋孫復（992-1057）、崔子方（?-1094-1098-?）等附和之，亦主張「尊經排傳」、以經明經。傳王安石（1021-1086）不信《春秋》，致詆為「斷爛朝報」；¹³趙鵬飛（?-1272-?）《春秋經筌》主張以《經》明《經》，「若其不可通，不得已而后求之《傳》」。¹⁴學者遂不免質疑，為問：治《春秋》者，果真「獨抱遺《經》」，即可解讀《經》說？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¹⁵如之何而可「無傳而著」？綜考歷代《春秋》學之論著，研究之視角聚焦於屬辭比事，徵諸《春秋》學史作佐證，筆者提出考求《春秋》之義之法門有三：或據比事，或憑屬辭，或兼二者而一之以見義。總之，任擇其一，皆可以顯法相而明《春秋》之義。漢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宋朱熹謂：「《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¹⁶其義，如形而上之道；其事、其文，屬形而下之器。即器可以求道，順指可以得月，朱子之意蓋如此。

¹² [清]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卷48〈經解第二十六〉，頁1254。

¹³ 王安石不信《三傳》，而未嘗不信《春秋》。然《春秋》終未立於學官，致有「斷爛朝報」之說。參考[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裴汝識點校本：《王安石年譜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11，頁388-396。

¹⁴ [宋]趙鵬飛：《春秋經筌》（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通志堂經解》本）：「吾讀《春秋》，竊不喜學者以傳潤經。苟平定心氣，以經明經，若其不可通，不得已而后求之傳。然必合《經》文而無抵牾則從之，不然則無取也。吾讀《春秋》至此，間有不可考而求《傳》者五……非《左氏》無以考。則《左氏》於此，亦不可盡廢也。……」卷7，僖公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頁5，總頁11681。

¹⁵ [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元]虞集：〈原序〉，頁2，冊165，總頁3。

¹⁶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67〈易三·綱領下〉，頁1673。

孔子筆削魯史記，以作成《春秋》。筆削之際，自有孔子別識心裁之志，以及獨斷於一心之義，不可以書見，讀者所以難知、不可曉，以此。宋胡安國《春秋傳》，稱《春秋》為「史外傳心」；《朱子語類》載朱熹之說《春秋》，謂「有言外之意」、「都不說破」；¹⁷亦類比詩學、禪學語言以開示迷誤。元趙汭（1319-1369）著《春秋屬辭》，以或書或不書說筆削，闡發南宋陳傅良（1137-1203）《春秋後傳》之旨趣，有所謂「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推見其所書」者，¹⁸示學者以破解《春秋》「推見至隱」之津梁，假辭文以求義之要領。清常州莊存與（1719-1789）治《公羊》，亦盡心力於《春秋》之屬辭，其《春秋正辭》所謂「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¹⁹對於《春秋》之去取事迹，損益辭文，而見微辭隱義之筆削，有精簡之詮釋。孔子《春秋》寓含之義，既隱寓於文之所不載，「義」將如何體現？如何把握，成為歷代治《春秋》者之關鍵課題。有鑑於此，亟思廓清辨章之，故草撰本文以應之。

二、屬辭比事與孔子作《春秋》

春秋，本古代紀事史書之通稱。見於先秦載籍，有《夏殷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百國春秋》之名目，魯之《春秋》特其中之一而已。²⁰其後，孔子據《魯春秋》，而略施筆削，寄寓褒貶，側重人事，關切治道。²¹孔子《春秋》，因體現別識心裁、獨斷於一心之歷史哲學，遂與魯史《春秋》異轍分途，於是乃成專名。云「孔子作《春秋》」，《孟子》書中兩見，其苦心孤詣，著述旨趣，可得而言之：

¹⁷ 同前註，卷 83〈春秋綱領〉，頁 2146，廣錄；頁 2152，文蔚錄。

¹⁸ [元]趙汭：《春秋屬辭》（臺北：大通書局，1970 年），[清]納蘭成德編：《通志堂經解》（本），卷 8〈假筆削以行權第二〉，頁 2，總頁 14801。

¹⁹ [清]莊存與：《莊侍郎春秋正辭》，[清]阮元主編：《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 年），卷 387〈春秋要旨〉，頁 1，總頁 8443。

²⁰ 參考《墨子·明鬼》、《管子》、《汲冢·離婁下》、《史通·六家》所載。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 年），《左盒集》，卷 2〈古春秋記事成法攷〉，頁 1445。

²¹ 柳詒徵：《國史要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 年）〈史原第一〉，頁 7-8。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²²

儘管孔子作《春秋》，有其令人動容之使命感，奈何修史、作史乃史官之事，孔子無權越俎代庖；進退公卿，賞罰善惡，皆屬天子權責，孔子亦不得僭越。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²³《春秋》，有孔子「竊取」之義，故與魯史《春秋》不同：孔子《春秋》有義，魯史《春秋》無義。孟子又云：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²⁴

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²⁵

孔子《春秋》之作，統合其事、其文、其義三者而成。其義，即著述之旨趣，藉由事迹之具陳，文辭之修飾，脈注綺交於「其義」而體現。《公羊傳》以《春秋》為信史，「其序」猶《孟子》所謂「其事」，蓋序事實有秩序、有倫次。觀其事迹，玩其文辭，孔子所寄寓，以為僭越有罪之「義」，遂呼之欲出。由此觀之，《公羊傳》說《春秋》，凸顯「其序」、「其詞」，以見孔子之取義，所謂道不離器，神不

²² 〔戰國〕孟軻著，〔漢〕趙岐注，〔清〕焦循疏，沈文偉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1996年），卷13〈滕文公下·我豈好辯哉〉章，頁452。

²³ 〔宋〕胡安國：《春秋傳》，自序稱孔子作《春秋》，「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大要責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卷首，頁1。

²⁴ 〔戰國〕孟軻著，〔清〕焦循疏：《孟子正義》，卷16〈離婁下·王者之迹熄〉章，頁572-574。

²⁵ 〔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本），卷22，昭公十二年，頁19-20，總頁282。

離形，亦相生不二之道也。

孔子既歿，門弟子傳其學。《禮記·經解》論述《六經》教人之得失，其中有「《春秋》教」，揭示《春秋》研讀之要領，詮釋之津梁，可謂具體而微，成效卓著，如云：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²⁶

何謂屬辭？何謂比事？歷代禮學家、《春秋》學家、史學家說解頗見紛歧。今綜合王夫之(1619-1692)、毛奇齡(1623-1716)、孫希旦(1736-1784)、姜炳璋(?-1754-?)、章學誠(1738-1801)、鍾文蒸(1818-1877)六家之見，²⁷界定如下：所謂屬辭比事，指辭文之散漫橫梗者，宜統整連屬之；載事之參伍懸遠者，當比次類及之。原始要終，張本繼末，宏觀綜覽之，系統尋繹之；如此，可作解讀《春秋》之要領，詮釋《春秋》之津筏。其法先作比較、歸納，然後再作類推、演繹。《春秋》一萬六千餘言，由辭見事，理解不難；然義指寓乎事與文之中，幽微隱晦，非有奇特法門，索解不易。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稱：「《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春秋》書法常例以外之變例，尤其難知。解讀之道，一般而言，多「移其辭，以從其事」；若「辭不能及，皆在於指」，則「見其指者，不任其辭」。²⁸要之，就載事、屬辭，可以考求《春秋》之指義。

考察孔子《春秋》寄寓之微旨隱義，所以必須憑藉「屬辭比事」之法者，原

²⁶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本），卷50〈經解第二十六〉，頁1，總頁845。

²⁷ [清]王夫之：《船山全書·禮記章句》（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經解〉，頁1172。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卷29〈論文示貽選〉，頁752。
[清]毛奇齡：《春秋屬辭比事記》（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皇清經解》本），卷1，頁7957。
[清]姜炳璋：《讀左補義》（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同文堂藏版），卷首〈綱領下〉，頁106-107。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卷48〈經解第二十六〉，頁1254。
[清]鍾文蒸：《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屬者，屬合之。比者，是其本教也。」卷首〈論經〉，頁10。

²⁸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卷2〈竹林第三〉，頁32。

因有二：其一，《春秋》為編年體，「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故相關事迹分散，不相連貫。屬辭比事之法可以統合分散，濟編年體之窮。其二，歷史之演進，有積漸、無頓變，所謂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春秋》編年既苦於星散，唯有運用比事屬辭，可以會通參伍而統整散漫。所謂積漸者，指事之本末始終。誠如元程端學（1280-1336）《春秋本義》所云：「一事必有首尾，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或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²⁹夷考其實，屬辭比事之教，不過回歸古春秋「原始要終，本末悉昭」之記事成法而已。³⁰

有關孔子之作《春秋》，西漢文獻中，董仲舒《春秋繁露》、司馬遷《史記》，頗多闡發，可與《孟子》說《春秋》相互發明。舉凡《春秋》之制義法，中有孔子筆削之事，修飾之辭，已隱約表出。孔子之孤懷宏識，《春秋》之著述旨趣，董仲舒《公羊》學略有提示。董仲舒之提示，直接沾溉司馬遷《史記》之《春秋》學，影響後世既深且遠，如：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心）。《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³¹

……故子夏言：「《春秋》重人」，諸譏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憤怒，或暴虐賊害人，終皆禍及身。……上奢侈，刑又急，皆不內恕，求備於人，故次以《春秋》緣人情，赦小過。而《傳》明之曰：「君子辭也。」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緣人情，赦小過。³²

作《春秋》，本史官之天職。孔子無官守、無言責，卻僭越史權而替代天子施行賞罰，裁判公卿。「上探天瑞」以下五句，乃董仲舒對《春秋》著述旨趣之領會與詮

²⁹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60，卷首〈春秋本義通論〉，頁4-5，總頁33。

³⁰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第3冊，《左盒集》，卷2〈古春秋記事成法攷〉，頁1，總頁1445。

³¹ [漢]董仲舒著，[清]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卷6〈俞序第十七〉，頁6，總頁111。

³² 同前註，頁9，總頁113。

釋。「引《史記》，理往事」二句，點明《春秋》據魯《史記》筆削修纂，此攸關史事之編比。「正是非，見王心」云云，則是《春秋》「何以書」之「取義」。《春秋》因事屬辭，即事可以顯義。誠如宋蘇洵（1009-1066）〈史論上〉所謂：「事以實之，詞以章之」；³³於是即器求道，空言載理之「義」，可以表出。故曰：「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比事與屬辭，為《春秋》「如何書」之要領，涉及事實之編比，文辭之修飾。必須精心安排措置，方能體現「何以書」之「義」。《春秋繁露·俞序》所謂「緣人情，赦小過」，此統合其事、其文、其義而言之，而較側重「其文則史」之屬辭原則。《公羊傳》再三強調：《春秋》文辭曾經孔子修飾，所謂「君子辭也」。司馬遷問學於董仲舒，故《史記》亦頗言《春秋》修纂之性質，如：

（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決。³⁴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³⁵

此所指《史記》，即魯史《春秋》，《公羊傳》所謂《不脩春秋》者是。孔子作《春秋》，大抵依魯史春秋進行筆削修纂。所謂筆削，或為史實之取捨，或為史文之修飾。國史不容改易，但為體現《春秋》特識之「義」，故可作或詳或略，或去或取之別擇，此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所謂「去其煩重」。而所謂「約其辭文」者，指《春秋》辭文有孔子簡擇、修飾、潤色之工夫，此即「屬辭」之《春秋》教，要皆緣「義」而發。清方苞（1668-1749）〈又書貨殖傳後〉說義法，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此乃藉「事」與「辭」以表「義」之方法。³⁶憑藉事之比，

³³ [宋]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9〈雜論·史論上〉，頁229。

³⁴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14〈十二諸侯年表·序〉，頁6，總頁235。

³⁵ 同前註，卷130〈太史公自序〉，頁21，總頁1337。又，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冊，《春秋緯》引《漢逸叢書》，原典蓋出於《史記·太史公自序》，文意從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變化而來。頁904。

³⁶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方苞論古文義法——以《文集》之讀史、序跋為核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0期（2015年1月），頁225-260。

辭之屬，《春秋》之義法，即寄寓其中。辭離乎事，無案而斷，謂之空言，空言無據難信從。舉凡筆削之義，獨斷之識，若能「見之于行事」，則出言有據，別識心裁不蹈虛踏空，較之以義說經，自然深切著明。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引孔子曰：「吾因行事而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正人倫、明順逆，皆是《春秋》之所取義，即所謂「加王心」；假其位號、因其成敗，則是「因行事」之載事。又稱：「仲尼之作《春秋》也，……引《史記》（案即《不脩春秋》），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心）」，³⁷所謂「引《史記》，理往事」，指《春秋》之載事；而「正是非，見王心」，則是《春秋》之取義。〈玉杯〉篇曾揭示天下後世治《春秋》之法，頗強調「其文則史」之修辭，此即《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其說云：

《春秋》……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³⁸

「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指「其文則史」之屬辭。《公羊傳》閔公元年引子夏曰：「以（不脩）《春秋》為《春秋》」，可證孔子作《春秋》，所據魯國史（即《不脩春秋》）載事不容更動，取義既有歸趣，文辭自有所修飾，以折衷乎載事與取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亦就辭文修飾，史事筆削，取義確立三者而言之，此所謂「屬辭比事」之教。

東晉徐邈（344-397）《春秋穀梁傳注義》稱：孔子因魯史記而脩《春秋》，「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³⁹即是纂修《春秋》之不二原則。排比史事，連屬辭文，而後《春秋》之微辭隱義，可求而得。其事之筆削，其文之修飾，亦有規準。其事與其文之間，自有主從、重輕之關係，如云：

³⁷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義證》，卷6〈俞序第十七〉，頁111、114。

³⁸ 同前註，卷1〈玉杯第二〉，頁22。

³⁹ [晉]徐邈：《春秋穀梁傳注義》（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本），經編·春秋類，頁1408。

……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為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於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⁴⁰

《春秋》之辭文，絕不憑空虛加；縱然為親者諱、為尊者諱，而不得不曲筆隱飾，亦多「指事而書」，以「不沒其實」為原則。宋程頤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云：「《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⁴¹宋胡安國稱：「仲尼因事屬辭」，「智者即辭觀義」；《春秋》以「見諸行事」而「深切著明」；由於筆削魯史，而成「史外傳心」之作。朱熹亦謂：「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聖人且據實而書之，……蓋有言外之意」；「《春秋》卻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道理去折衷」，⁴²《春秋》據事實表述，故「都不說破」，「蓋有言外之意」。由此可見，《春秋》之作，史事為主、為重；辭文為從、為輕。清方苞《春秋通論》謂：「《春秋》因事屬辭，各得其實，而是非善惡無遁情焉。」⁴³亦強調事實之體現，正所謂事外無理，理在事中。

今考察《公羊傳》之說《經》，有所謂「君子修之」、「君子辭也」、「君子加弑焉爾，君子之聽止也，君子之赦止也」云云，⁴⁴足證《春秋》經文必多修飾，皆出於孔子手訂。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稱：「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⁴⁵錢穆（1895-1990）《中國史學名著·春秋》明言：「孔子對《春秋》舊文，必有修正無疑。但所修者主要是其辭，非其事，由事來定辭，

⁴⁰ 同前註，經編·春秋類，頁1404。

⁴¹ [清]孫承澤：《春秋程傳補》，收入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卷首〈伊川程子經說〉，頁6，總頁3。

⁴²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83〈春秋綱領〉，頁2145、2149、2152。

⁴³ [清]方苞：《春秋通論》，卷4〈通例七章〉其二，頁18；冊178，總頁346。

⁴⁴ 《公羊傳》宣公六年：「親弑君者趙盾，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穿緣民眾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5，桓公十八年：「雖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頁68；卷6，莊公七年：「君子脩之曰：『星實如雨』」，頁81；卷9，閔公元年：「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頁114；卷16，宣公十二年：「何以書葬？君子辭也。」頁203；卷23，昭公十九年：「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頁292。

⁴⁵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史德〉，頁148。

由辭來見事」；⁴⁶事見而辭定，具事、憑文，而後《春秋》寄寓之微言大義，乃呼之欲出。由此觀之，所謂屬辭、其文則史、約其辭文、君子修之云云，皆可見遣詞造句為解讀《春秋》書法之津筏。掌握《春秋》之屬辭，可以推敲載事之大凡，深究取義之緣由。錢鍾書（1910-1998）《管錐編》再三申言：「《春秋》書法，即文章之修辭」，⁴⁷此說有理，深得我心之所同然。⁴⁸

比事，苦於篇分；屬辭，則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解讀《春秋》，能運以屬辭比事之法，則《春秋》三傳或可束諸高閣。清顧棟高（1679-1759）《春秋大事表》曾徵引韓昌黎此詩，且論斷曰：「『究終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屬辭之法。」⁴⁹元趙汴著《春秋屬辭》，〈自序〉云：「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⁵⁰清張自超（?-1703-?）著《春秋宗朱辨義》，「凡所辨論，必反覆前後所書，比事以求其可通」，頗得比事屬辭之旨。⁵¹清方苞著《春秋通論》，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意，貫穿全經，案其所屬之辭，核以所比之事，以考求《春秋》書法。⁵²又著《春秋直解》，「以比事屬辭之義，分疏其條理，俾按以全經，而始終相貫」，

⁴⁶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2001年）〈春秋〉，頁21。

⁴⁷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年），冊5，〈左傳正義〉一二，「閔公二年」，增訂三，頁20。冊3，〈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三一，《全後漢文》，卷1，頁967-968。

⁴⁸ 筆者受錢鍾書啟示，往往持修辭學視角研究《春秋》，如〈《春秋》書法之修辭觀〉，汪榮祖主編：《錢鍾書詩文叢說》（中壢：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1年7月），頁331-380。〈從屬辭比事論《公羊傳》弑君之書法——《春秋》書法之修辭觀〉，《東華漢學》第18期（2013年12月），頁135-188。〈即辭觀義與方苞《春秋直解》〉，高雄師大《經學研究集刊》第16期（2014年5月），頁1-34。〈因文取義與《春秋》筆削——方苞「言有序」之修辭詮釋〉，臺南大學《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第48卷第2期（2014年10月），頁1-32。

⁴⁹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首〈讀春秋偶筆〉，頁47。

⁵⁰ [元]趙汴：《春秋屬辭》（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通志堂經解》本）〈春秋屬辭序〉，頁14677。

⁵¹ [清]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78，〈總論〉，頁1，總頁2。

⁵² [清]方苞：《春秋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178，卷首《春秋通論》提要，頁5，總頁293。

⁵³由此觀之，無論趙汴《春秋屬辭》、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方苞《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皆以屬辭比事作為解讀《春秋》微言大義之法，所謂「案其所屬之辭，核以所比之事」，以經明經，即可得孔子作《春秋》之所取義。

程子曰：「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此即屬辭比事，探究終始。考求《春秋》之義，其法一也。除此之外，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胡安國《春秋傳》云：「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此注重以史傳經，著其行事。探尋《春秋》之義，其法二也。空言載理，無案而斷，微言大義，時措從宜。朱子所謂「言外之意」、「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方苞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可以即器求道，因文取義矣。此索解《春秋》之義，其法三也。總之，屬辭比事、以史傳經、以義理折衷三者，皆求《春秋》義之津梁；而其要歸，則在屬辭比事之書法。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稱：「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⁵⁴歷代《春秋》學家，盡心致力處，當在考求《春秋》「都不說破」之「微辭隱義」，破解孔子別識心裁之「言外之意」。《孟子·離婁》、《禮記·經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已略作揭示「其事其文，藉為存義之資」；學者經由載事、修辭，可以考求《春秋》寄寓之「義」，猶即器以明道，順指而得月。章學誠〈答客問上〉稱：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⁵⁵

如何考求《春秋》之義？章學誠提示一具體可行之法門：「《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云云。事具始末，為比事之功；

⁵³ [清]方苞：《春秋直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本），經部春秋類，〈序〉，頁2。

⁵⁴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言公上〉，頁107。

⁵⁵ 同前註，內篇四〈答客問上〉，頁138。

文成規矩，爲屬辭之法，而詳略、異同、重輕、忽謹，乃至於顯晦、曲直、先後、虛實之斟酌與安排，即爲比事與屬辭之加乘，而體現爲「獨斷於一心」、「成一家之言」之別識心裁，所謂「筆削之義」、「昭乎筆削」者是。

清道光咸豐間（1821-1856），內閣中書張應昌（?-1825-1865-?），積三十年精神功力，著成《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堪稱煌煌鉅著，洋洋大觀。詹事府詹事夏同善等奏進本書云：其書以屬辭、變例二者命編，「所以類其事、顯其文，而因以著其義也。」⁵⁶由此觀之，本書蓋持「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解說《春秋》筆削之旨。其書〈凡例〉有言：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聖經書法，必聯屬其辭，排比其事，而乃明。是以先儒沈氏文伯有《春秋比事》、趙氏東山有《春秋屬辭》。國朝毛氏西河有《屬辭比事記》、方氏望溪有《比事目錄》。他如曰統紀、曰提綱、曰通論、曰大事表等編，皆以屬比顯筆削之旨也。言屬辭，則比事該之矣。⁵⁷

何謂「屬辭比事」？諸家解說互有優劣，而王夫之、毛奇齡、姜炳璋、章學誠、孫希旦、鍾文烝六家之說較優，說已見前。今觀張應昌之書，以「聯屬其辭」，釋屬辭；以排比其事，解「比事」，言簡意賅，精確明白，似又殊勝前述六家。其書以屬辭比事之法，考察《春秋》之微辭奧旨，進而推求孔子筆削之大凡。誠如張應昌〈凡例〉所云：「惟屬其辭，比其事，破其褒貶穿鑿之例，而孔子所云竊取其義者自見焉。」⁵⁸歷代《春秋》學論著，探討屬辭比事課題者，張氏枚舉宋沈棐、元趙汭、清毛奇齡、方苞四大家。其他或書名未標比事、屬辭，而內容實相近相關，如《春秋統紀》、《春秋提綱》、《春秋通論》、《春秋大事表》等等，書中亦闡發屬辭比事之法，以顯映筆削之旨，是所謂異曲而同工。張應昌歸納統整之，名號歸一，亦治《春秋》之一助也。

近代哲學家熊十力（1884-1968），著有《讀經示要》三卷，其中云：「孔子之道，內聖外王，其中具在《易》、《春秋》二經」；且強調：「《易經》備明

⁵⁶ [清]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同治十二年江蘇書局刻本），卷首，詹事府詹事夏同善等繕進〈奏章〉，頁1。

⁵⁷ 同前註，〈凡例〉，頁1，總頁6。

⁵⁸ 同前註，頁2，總頁7。

內聖之道，而外王賅焉；《春秋》備明外王之道，而內聖賅焉。二經制作極特別，皆義在於言外。《易》假象以表意，……《春秋》假事以明義。」⁵⁹稱說《春秋》之制作，為「義在於言外」，乃南宋朱熹、家鉉翁之外第三人。《朱子語類》載朱熹稱《春秋》：「蓋有言外之意」，「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家鉉翁（1213-1286?）《春秋集傳詳說·原序》謂孔子：「因魯史脩《春秋》，垂王法以示後世」；其書「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⁶⁰前乎此者，胡安國《春秋傳·序》曾推重《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典」；由此觀之，諸家解讀《春秋》經旨，曰史外傳心，曰絕出語言文字之外，曰都不說破，曰有言外之意云云，皆與熊十力所謂「義在於言外」，指趣相當，足相發明。

《朱子語類·論文》又謂：「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⁶¹清方苞論「義法」曰：「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上》稱：「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嘗試較論，就考求《春秋》書法而言，其事其文，方苞謂之法，猶朱子所謂文，家鉉翁所謂語言文字，章學誠所謂其事與文，熊十力所謂言；而孔子竊取之「義」，古文義法之「義」，章學誠《春秋》志業之求義，熊十力所謂「假事以明義」，相當於朱子所謂「道」；所不同者，根本與枝葉往往相濟為用，相得益彰。朱子所謂體用不二者，求索《春秋》之義，往往即體即用，體用混成。

綜要言之，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者，緣因有五：其一，《春秋》為編年體，屬辭比事之法，可以整合分散，救濟編年體之窮。其二，歷史有漸無頓，事件有本末始終；運用比事屬辭之法，可以會通參伍、統整散漫。其三，屬辭比事之教，無異「原始要終，本末悉昭」之古春秋記事成法，以此詮釋《春秋》，故多怡然理順。其四，屬辭比事之法，經由比較、統計、歸納、類推，而考求《春秋》之義，系統而宏觀，可以發微闡幽，有功聖《經》。其五，《春秋》記事，「一事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至重。

⁵⁹ 熊十力：《讀經示要》，初印於重慶南方印書館，1945年；1949年，上海正中書局以線裝本重印。今據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再版本，卷3，二、〈春秋及尚書〉，頁142。

⁶⁰ [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原序〉，冊158，頁4。

⁶¹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139〈論文上〉，頁3319，個錄。

其積漸之勢，誠如孔廣森（1752-1877）所言：「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

屬辭比事也者，究竟為兩個獨立之詞組？或是會通化成為一之詞彙？清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毛奇齡《春秋傳》，看作兩個獨立之詞組。⁶²其他，《三傳》注疏宋元明清《春秋》學者，視屬辭比事為不可分割之求義書法者，要居多數。由此觀之，考索《春秋》之微辭隱義，以經明經，不假外別求，其法門大抵有三：其一，比次史事以見義；其二，連屬辭文而顯義；其三，探究終始而示義。由於篇幅所限，今僅能就「比次史事以見義」舉例論說。

三、比次史事以見義：捨傳求經法門之一

《左傳》成公十四年援引「君子曰」，稱述《春秋》五例，其四曰盡而不汙。⁶³晉杜預（222-284）〈春秋序〉解讀之，指為「直書其事，具文見義」；唐孔穎達（574-648）《春秋左傳正義》謂：「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⁶⁴《朱子語類》載朱熹之言：「《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勸之以為鑑戒」；「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⁶⁵明湛若水（1466-1560）《春秋正傳·自序》云：「聖人之心存乎義，聖人之義存乎事」，⁶⁶故據事可以求得其義，可以探知聖心之旂向。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述仲尼之作《春秋》，引孔子曰云云，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演說之，亦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

⁶² [清]萬斯大：《學春秋隨筆》，輯入阮元主編：《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73年），卷50〈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頁15，總頁768。[清]毛奇齡：《毛檢討春秋傳》，輯入阮元主編：《皇清經解》，卷120「二曰事例」、「三曰文例」，頁9-10，總頁7673。

⁶³ 有關「《春秋》五例」之近人解說，可參考王基倫：〈《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國文學報》第39期（2006年6月），頁1-34。

⁶⁴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本），卷首〈春秋序〉，頁17，總頁14。

⁶⁵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83〈春秋綱領〉，頁2144、2145、2146。

⁶⁶ [明]湛若水：《春秋正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自序〉，冊167，總頁39。

著明」；⁶⁷所謂「王心」，所謂「空言」，即孔子《春秋》之取義；而所謂「行事」，則是《春秋》之事迹、人物之行爲。徒託空言，無案而斷，不如即器明道，藉行事以示褒貶。宋胡安國《春秋傳》云：「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⁶⁸故胡《傳》雖闡發程頤「以義例解經」之教，亦兼採《左傳》之歷史敘事，所謂「行事然後見其用」也。

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稱：「《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⁶⁹藉比事而歸納凡例，因凡例而考求聖心，自是求義之一法。由此觀之，考據事實，以求書法，自是治《春秋》之一大要領。宋葉夢得（1077-1148）《春秋傳》自序稱：「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⁷⁰微辭隱義，爲《春秋》研治之主軸，「不得於義，則考之於事」，事與義可以相互發明，相得益彰。以魯隱公見弑而言，《春秋》止書「公薨」，不書葬，固由於不成喪，據實微婉表述，所謂推見至隱，而義在其中矣。《左傳》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有所謂「微而顯」者，爲《春秋》五例之一，乃曲筆書法之一種，謂措詞簡約，而意指明顯。《春秋》於隱公遭弑，但書「公薨」二字，準以比事屬辭之書法，通全《經》而觀之，與其他正常死亡書地、書葬之書法，作比較、歸納、分析、類推，知公薨而不書地、不書葬，書法相當特別，季本以爲「欲以起問，見其有故也」；此之謂特筆見義。從其不書葬，按以全經「公薨」書例，而譏貶罪過之義，乃見於言外。季本所謂「據其實，而義自見」，全《經》不書、諱書；多近是，可以類推。

（一）敘事見義與宋元《春秋》學

《春秋》根源魯史記，或筆或削，或損或益，其中自有孔子獨斷於一心之別識心裁，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可見，《經》雖宗本於史，然已與史不同；孔子作《春秋》，因事而屬辭，辭文雖有損益修飾，而「事仍本史」，始終

⁶⁷ [漢]司馬遷著，[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130〈太史公自序〉，頁1337。
又，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春秋緯》引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頁904。

⁶⁸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首〈春秋傳序〉，頁1。

⁶⁹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1〈春秋序〉，頁16。

⁷⁰ [宋]葉夢得：《石林先生春秋傳》（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通志堂經解》本），卷首〈石林先生春秋傳序〉，頁2，頁11917。

爲作《經》之不變原則。宋蘇轍（1039-1112）著《春秋集解》，於北宋捨傳求經之風潮中，特別標榜據事「從史」以解經，曾云：

故凡《春秋》之事，當從史。《左氏》，史也。……蓋孔子之作《春秋》，事亦略矣，非以爲史也，有待乎史而後足也。

《春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非自以爲史也。世之爲《春秋》而不信史，則過矣。⁷¹

自東漢賈逵（30-101）治《春秋》、《左傳》，即以闡明事件之原委，作爲《經》說方法之一。⁷²其後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亦以「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詮釋經傳。⁷³要皆考察古春秋記事成法，所謂「爰始要終，本末悉昭，則記事以詳爲尚」。⁷⁴據此，則蘇轍《春秋集解》所謂：「凡《春秋》之事，當從史」；「《春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可以明其所以然。蘇轍治《春秋》，多從史解經；然《春秋》載事頗略，故有待《左氏》以史傳經，而後完備。蘇轍主張「以史傳經」，南宋胡安國、陳傅良、朱熹，元代黃澤（1260-1346）、趙汴說《經》，多受其影響。

程、朱理學家於《春秋》，頗多關注，惜未有成書。北宋程頤著有《春秋傳》，雖未成專著，然其發蹤指示，沾溉胡安國《春秋傳》，又影響朱熹之《春秋》觀。故其說雖吉光片羽，亦頗可寶貴。程頤曾言：

《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他經非不可以窮理也，但論其義耳。《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⁷⁵

⁷¹ [宋]蘇轍：《春秋集解》（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經苑》本），卷1，頁4，總頁2550；總頁2613。

⁷² 程南洲：《賈逵之春秋左傳學及其對杜預注之影響》（臺北：文津出版社，1981年），第三章〈賈逵訓釋春秋左傳所用之方法〉，十一、「據史實以釋之」，頁104-105。

⁷³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1，頁12，總頁11。

⁷⁴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第3冊，《左盒集》，卷2〈古春秋記事成法攷〉，頁1，總頁1445。

⁷⁵ [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首下〈述綱領〉引「河南程頤曰」，頁4，冊

《春秋》爲記事之書，筆削損益、提要鉤玄，以見綱目，文字謹嚴要妙，故曰「一句即一事」。據此言之，《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撮列一千八百餘條，即載記一千八百餘事件。事有去取，文有修飾，通全《經》而觀之，具事憑文，往往可見「言外之意」，故曰「是非便見於此」，可作窮理之要，盡道之資。所以然者，孔子作《春秋》，「因其行事」而屬辭，讀者「即辭以觀義」，則是是非可見，功過可明，治亂可考，且盛衰可知，故程子以《春秋》爲「窮理之要」。誠如胡安國《春秋傳·序》所云：「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

宋室南渡，偏安武林，內憂外患，持續加重。胡安國感激時事，奉詔著成《春秋傳》三十卷。志在匡時，多藉《春秋》之事，以發其宏論，往往借《春秋》以寓意，故或有未合於《經》旨者。其《春秋傳·序》頗言具事見義之原委，影響朱熹之《春秋》觀，如：

……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⁷⁶

前述蘇轍之《春秋》觀，特提「《春秋》之事，當從史」；「《春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董仲舒、司馬遷、胡安國所謂「見諸行事」，即指孔夫子「假魯史」以修纂《春秋》，由於具事可以見義，故曰「深切著明」；可以寓王法，故曰「然後見其用」，此即器可以求道，以《經》明《經》，往往無傳而著。胡安國〈進（《春秋傳》）表〉稱：「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⁷⁷孔子作《春秋》，以取義爲依歸，繼則因事屬辭，所謂「敘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者是；而讀者「即辭以觀義」，於是五倫之惇厚、五禮之施行，已體現語言文字之外，此之謂「見其用」；故曰「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胡安國推崇孔子作《春秋》，以爲「乃史外傳心之要典」，⁷⁸《春秋》以「見諸行事」，而「深切著明」，固有待於史；然藉筆削損益，寓含微辭隱義，多見於其事其文之外。魯史記無「義」，而孔子《春秋》有「義」，故指《春

165，總頁 22。

⁷⁶ [宋]胡安國：《春秋傳》，卷首〈自序〉，總頁 1-2，總頁 13。

⁷⁷ 同前註，卷首上〈進表〉，頁 4，冊 165，總頁 17。

⁷⁸ 同前註，卷首〈春秋傳序〉，總頁 1；又，〈進表〉，總頁 4。

秋》爲「史外傳心」之要典。

朱熹於《春秋》未有成書，然《朱子語類》載存〈春秋·綱領〉，可窺其《春秋》觀。朱熹於《春秋》、《三傳》則據《左氏》，近世則推崇胡安國《春秋傳》，此與治學注重徵實有關。朱熹之《春秋》觀，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據實直書，其義自見。曾言：「《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又曰：「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又稱《春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見」；又謂：「聖人作經，直述其事，固是有所抑揚」；又云：「聖人即史法之舊例，以直書其事，而使之不失其實耳，初未嘗有意於褒之貶之也」。⁷⁹以今觀之，凡此皆能以敘事見義。朱子稱《春秋》於義，「都不說破」，往往見諸「言外」；⁸⁰此正切合《春秋》學者所云，「其義」蓋憑藉其事其文以體現；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所云：「於序事中寓論斷」，⁸¹可以類比。

南北宋之交，因應時局變革，於是蔚爲《春秋》學之蓬勃。除胡安國《春秋傳》外，又有葉夢得堪稱《春秋》學名家，著有《春秋傳》二十卷、《春秋考》十六卷、《春秋三傳讞》二十二卷。葉氏信《經》不信《傳》，闡揚中唐啖助、趙匡以《經》明《經》之理念。其言曰：

夫《春秋》者，史也；所以作《春秋》者，經也。故可與通天下曰事，不可與通天下曰義。《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

⁷⁹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83〈春秋綱領〉，頁2144、2145、2146、2157。又，[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卷60〈答潘子善（時舉）〉，頁3141-3142。

⁸⁰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83〈春秋綱領〉，頁2152-2153。

⁸¹ 顧炎武曾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雖以之指稱《史記》，然《春秋》本魯史而作，《史記》序事多踵法《春秋》，故顧氏之見亦可適用於《春秋》。文見[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26〈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頁1429。

猶天之在上，有目者所可共觀；則其為與為奪，為是為非，為生為殺者，庶幾或得而窺之矣。⁸²

葉夢得視《春秋》為史書，故治《春秋》，較重視史實；往往斟酌《三傳》，以求史實與大義之契合。⁸³視《春秋》為史，指齊桓、晉文諸史事；《春秋》有孔子之筆削，於是寓存大義微言，不可以書見。較諸記事「可與通天下」，《春秋》之取義為孔子之獨斷與別識，高弟子夏尙不能贊一詞，何況他人？故曰「不可與通曰義」。如何考求「不可與通」之義？葉氏提出「事義更相發明」之法，所謂「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此攸關器與道、事與義間之辯證，事外無理，理在事中，猶華嚴禪宗之理事圓融無礙，⁸⁴故具事可以求義，排比編纂事跡，而與奪、是非、生殺、褒貶，可體現於文字之外。

葉夢得與蘇轍皆注重「事義更相發明」，唯如何發明，二家策略不同：葉夢得《春秋傳》以為《三傳》互有得失：《左氏》詳於史而不知經，《公》《穀》詳於經而不知史，故乃斟酌《三傳》，而求其史與經。蘇轍考《春秋》之筆削魯史事跡而見義，義即寓存於《春秋》之其事其文之中，是謂以經明經。葉夢得治《春秋》，求索於《經》外，所謂「不得於事者，則考於義；不得於義者，則考於事，更相發明。」葉氏折衷《三傳》，以闡明《春秋》之義，故與蘇轍以史傳經，專主《左傳》敘事不同。蘇轍《春秋集解》以為《春秋》並非史書，所謂「《春秋》者有待於史而後足，非自以為史也」；「孔子之作《春秋》，事亦略矣，非以為史也」，說已見前。以今日觀之，《春秋》參考魯史而有筆有削，「事仍本史，文有損益」，近似歷史哲學，中有孔子之別識心裁，已與《未修春秋》判然有別，故曰「非以為史也」，然又「有待乎史而後足」，故曰《春秋》之事「當從史」。

葉夢得《春秋》學三書，有其區隔：《春秋讞》側重「破」、《春秋考》著意「立」、《春秋傳》則其《春秋》學之集中體現。⁸⁵《春秋考》曾提示捨傳求經

⁸² [宋]葉夢得：《石林先生春秋傳》，卷首〈自序〉，總頁11917。

⁸³ 沈玉成等：《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八章第二節〈葉夢得：重視訓詁和史實〉，頁226。

⁸⁴ 理與事之辯證，可參考吳言生：《禪宗思想淵源》（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七章〈《華嚴經》、華嚴宗與禪宗思想〉，五、禪宗的理事圓融境，頁254-288。

⁸⁵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七章第六節〈葉夢得〉，頁

之順序：

《春秋》有可以事見者，求以事；事不可見，而可以例見者，求以例。事與例，義在其中矣。有事與例俱不可見，而義獨可推者，求以義；義者，理之所在也。有事與例與義俱不可見，而意可通者，求以意。意者，人情之所同也。莫易乎事，莫難乎意。⁸⁶

葉夢得主張信經輕傳，以經明經，「求聖人之義於聖人所筆之書」。其探求要領有四：依照優先順序，「求以事」第一，其次「求以例」，其次「求以義」，而「求以意」居殿。葉夢得以爲：探求《春秋》，「莫易乎事，莫難乎意」，故無論定讞、考證、傳經，多持史實作權衡。葉氏以爲：「古之爲書者，皆有凡有目：凡者，其略也；目者，其詳也」；「故經者，史所謂凡者也；傳者，史所謂目者也。」⁸⁷治《春秋》者，除求以事、求以例、求以義、求以意之外，若能憑藉《左氏》敘事之傳，自有助於因事明義。葉氏《春秋考·統論》稱：「《春秋》者，古史之凡；而其目則在史」，事與義既須兼顧，經與史尤應並重，故《三傳》中較尊重《左傳》。此與《左氏》以歷史敘事解釋《春秋》經，求以事、求以例與之相近，理或然也。

《春秋》有筆有削，其中有孔子之別識心裁在。《公羊》、《穀梁》欲因事明義，以義解經，然病在未究本末而設義以行，褒貶遂流於浮濫。唯《左傳》以史傳經，有本末，存實事，故大義微言得以考求，葉適（1150-1223）《習學記言》主張讀《春秋》者，不可以無《左傳》，因爲「實事不沒」，「大義有歸」：

……既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實事不沒。雖學者或未之從，而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以無《左氏》。二百五十五年明若畫一，無訛缺者。捨而他求，焦心苦思，多見其好異也。……故徵于《左氏》，所以言《春秋》也。始卒無舛，先後有據，而義在其中，如影響之不違也。⁸⁸

538-541。

⁸⁶ [宋]葉夢得：《春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統論〉，頁20-21；冊149，總頁259-260。

⁸⁷ [宋]葉夢得：《春秋考》，卷1〈統論〉，頁2；冊149，總頁250。

⁸⁸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頁118。

《春秋》三傳之解經，葉適主《左傳》而非《公》《穀》，與蘇轍《春秋集解》近似。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曾稱美《左傳》，以為敘事尤備，「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⁸⁹葉適稱揚《左傳》能以比事見義，所謂「既有《左氏》，始有本末，而簡書具存，實事不沒」。敘事見本末始終，乃古春秋記事成法，更為編年體《左傳》之敘事特質；記事載人，貴真貴實，亦《左傳》敘事之本色。葉適說解《春秋》，主張當「徵于《左氏》」，如此，則「大義有歸矣！」所以然者，因為《左傳》以歷史敘事解釋《春秋》經，「始卒無舛，先後有據，而義在其中」矣！《宋書·禮志一》稱《左傳》：「張本繼末，以發明經義」，⁹⁰頗得其實。比次史事，可以考求《春秋》之微辭隱義，此又得一旁證。

選取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比較，以考求《春秋》之微辭隱義，宋沈棐、元趙汭、清毛奇齡、方苞，皆有著述，要皆企圖從史事之編比，以考求《春秋》之微辭隱義。其中，宋沈棐《春秋比事》堪稱斯學之開山，宋陳亮（1143-1194）為《春秋比事》作〈序〉云：

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此其為志亦大矣。……因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⁹¹

陳亮為沈棐《春秋比事》書作序，首先強調「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然致疑程顥《春秋傳》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以為如此，「則經可以無傳矣！」若捨傳求經，「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⁹²則如之何而可？

⁸⁹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清]錢儀吉：《經苑》本），卷1〈三傳得失議第二〉，頁4，總頁2358。

⁹⁰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二十四史》點校本），卷14〈志第四·禮一〉，太常荀崧上疏曰：「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義，信多奇偉，學者好之。」頁361，總頁99。

⁹¹ [宋]陳亮：《春秋比事·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頁1，冊153，總頁8。

⁹² [元]虞集云：「唐啖氏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明其能專求

陳亮以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由於具事可以見義，故曰：庶幾「以見聖人之志」。而沈棻所著《春秋比事》，陳亮評其書，以爲「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考」。棄傳可以求經，捨傳可以獨考，以比次事迹，可以明得失，知興廢，顯功過，見是非故也。唐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揭示「究終始」三字，爲捨傳求經之要法；陳亮序《春秋比事》所謂「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要皆中唐啖助、趙匡研究新《春秋》學派標榜「究終始」之以經明經法，亦即屬辭比事之《春秋》教也。

南宋趙鵬飛著《春秋經筌》十六卷，倡導以《經》明《經》，無傳而著，所謂：「學者當以無傳明《春秋》，不可以有傳求《春秋》」云云。⁹³其言曰：

《春秋》雖因文以見義，然不稽之以事，則文不顯；苟徒訓其文，而不考其事，吾未見其得《經》意也。⁹⁴

據胡安國之見，仲尼作《春秋》，因事而屬辭，後世讀《春秋》，即辭以觀義。《春秋》之義，則隱寓於其事與其文之所不載；若運以屬辭比事之法，則可以破解「都不說破」之「言外之意」。筆者以爲：考求《春秋》微辭隱義之法門有三：或憑辭文而見義，或藉事跡而見義，或究其終始而見義。趙鵬飛《春秋經筌》提出其文與其事之轉相發明，較之葉夢得《春秋傳》之「事義更相發明」，解讀層面更加週延而理想。《春秋經筌》一書，致力較多者當爲「核實見義」，亦即比次史事而美惡自見，如莊公三十一年《經》載：「春，築臺于郊。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魯莊公一歲而三築臺，《春秋》直書，比事見義，趙鵬飛說之曰：

……今莊之三築臺，所謂民欲與之偕亡者也。天災時變，無若莊公之多；工功力役，無若莊公之數；廩稍空虛，無若莊公之甚，而一歲之間三時役

於經也。」〔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首〈原序〉，頁2，冊165，總頁3。

⁹³ 〔宋〕趙鵬飛：《春秋經筌》（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通志堂經解》本），卷首〈自序〉，總頁11551。

⁹⁴ 同前註，卷3，桓公二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頁12，總頁11584。

民，以奉一己之樂。嗚呼！莊公之志慮精神蓋已荒矣。明年而即世，有以也夫！⁹⁵

趙鵬飛治《春秋》，主張以經明經，考事以得經義。《春秋》書莊公一歲而三築臺，比事以求其義，故有「民欲與之偕亡」之微旨。趙鵬飛進一步持比事屬辭之法，綜考莊公即位以來之天災時變、工功力役、廩稍空虛，役民奉己，於是斷定莊公之志慮精神已荒，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又如：

聖人於《春秋》，不妄假人以美名，不妄誣人以惡迹，必核其實而書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也，蓋謀伐晉矣。然徒次而不能伐，則《春秋》不以伐加之齊，晉何憾焉？……彼不能伐矣，而徒以次焉，聖人不遂加以伐之之惡，蓋迹未形而預加之，則人有所不服，非所以為大中之法也。故書其次，而義自見焉。⁹⁶

辭不虛加，指事而書，乃《春秋》書法之原則，晉徐邈《春秋穀梁傳注義》早有提示，說已詳前。孔子作《春秋》，不虛美、不隱惡，美惡功罪，「必核其實而書之」。趙鵬飛《春秋經筌》舉《春秋》書「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為例，原其情事，緣於齊衛聯軍而「謀伐晉」，彼「不能伐矣，而徒以次焉」，伐晉之謀既未付諸行動，故「聖人不遂加以伐之之惡」。齊衛軍事行動，只表現在「次于五氏」史實上，故《春秋》據實直書「次」，而其義自見。

宋元之際，有呂大圭（1252?-1275），為朱熹四傳弟子，著《呂氏春秋或問》二十卷。呂氏主《左傳》、尊《穀梁》，而排斥《公羊傳》，以為事蹟莫備於《左氏》，而義理莫精於《穀梁》。⁹⁷其中，有〈春秋褒貶論〉一文，如：

……是故有史官之筆，有夫子之筆。史官之筆，謂其事也；夫子之筆，謂其義也。因其事以著其義，而事實矣；明其義以錄其事，而義著矣。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知

⁹⁵ 同前註，卷4，頁29，總頁11643。

⁹⁶ 同前註，卷15，定公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頁18，總頁11891。

⁹⁷ [清]紀昀主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卷27〈經部·春秋類二〉，頁32，總頁569。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聖人者，謂其去煩剔蕪，得事之實，而是非邪正為不誣也。罪聖人者，謂其不純用魯史之文，而或出於夫子之筆削，則大嚴矣。⁹⁸

呂大圭《春秋或問》，於三傳主《左氏》，以為事蹟莫備於《左傳》。孔子作《春秋》，既筆削自魯史官纂修之史記，故其中自有因仍舊史者，所謂史官之筆；既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史，漫無褒貶，中有孔子之別識心裁，所謂夫子之筆削。若以《孟子》述《春秋》言之，前者為其事，後者為其義。胡安國稱：孔子因事而屬辭，智者即辭以觀義，是辭文為治經之媒介，而解讀《春秋》，其事居於關鍵，據事憑文以求義，則往往為學者探索《春秋》之志業。呂大圭以為筆削之途有二：其一，「去煩剔蕪，得事之實」，如所謂常事不書之類，指其事之筆削去取。其二，辭文之筆削，即所謂「不純用魯史之文，而或出於夫子之筆削」者。有因仍、有變革，此《春秋》筆削之功。

宋末元初家鉉翁著《春秋集傳詳說》三十卷，以為「《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詳或略，或書或不書，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⁹⁹因此，《左傳》敘事提供考求聖人旨意之時事，是標榜「如何書」之法，以見《春秋》「何以書」之義。《春秋》筆削，攸關褒貶，而因事屬辭，由辭見義，比事仍居關鍵地位。家鉉翁稱：

……故有《經》著其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恃之以傳，何可廢也。……使《左氏》不為此書，後之人何所考據，以知當時事乎？不知當時事，何以知聖人意乎？

100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稱《左傳》：「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

⁹⁸ [宋]呂大圭：《呂氏春秋或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本），冊158，頁4。

⁹⁹ [清]紀昀主纂：《四庫全書總目》，卷27〈經部·春秋類二〉，《春秋詳說》提要，頁35，總頁570。

¹⁰⁰ [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卷首〈春秋集傳詳說綱領〉，〈評三傳下·左傳〉，頁32-33，冊158，總頁21-22。

可知」。《左氏》歷史敘事之傳《經》貢獻，家鉉翁與陸淳觀點一致，皆深表肯定。《左傳》為魯史官左丘明所纂修，具體書寫「當時事」之原委曲折。程頤主張「以傳考經之事迹」，《左傳》之歷史敘事，固足資考證。後人據《左氏》敘事（比次史事），可以考證當時事件之原委始末，進而據《左傳》之敘事，以推知聖人之別識心裁，《春秋》之微辭隱義。由此觀之，說解《春秋》，《左傳》提供後人「因傳以求經」之法門，可以考據「當時事」，有羽翼聖經之功。

屬辭比事之《春秋》教，歷代治《春秋》者多作或主或從、或重或輕之取捨。南宋《春秋》學注重「比事」以見義，而以「屬辭」為輔。元代《春秋》學，則兼重「比事」與「屬辭」而一之，張本繼末，原始要終以求義，所謂「獨抱遺《經》究終始」。故「屬辭比事」之學，元人闡發獨多！

元程端學著《春秋本義》三十卷、《春秋或問》十卷、《春秋辨疑》二十卷。其《春秋本義》大旨主常事不書；《春秋》之義，有貶無褒。其說《春秋》，以為「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矣！」程端學之說略云：

《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若邵子（雍）謂：「錄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朱子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¹⁰¹

「事外無理，理在事中」，此宋明理學家之常言，蓋事之所在，道之所存也。程端學說《春秋》，標榜「屬辭比事」，強調「筆削之義」，主張直書實事，善惡自見；其大旨不外據比次史事以見微辭隱義，因而反對一字褒貶之說。故引邵雍言：「錄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又引朱熹說：「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所提「盡而不汙」，晉杜預〈春秋序〉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其中涉及書或不書之筆削去取。《春秋》之通例，常事不書，既已刪除不取，故所書多非「常事」；就所取所筆之非常事，比次其史事，連屬其辭文，於是可據事見義。蓋《春秋》因事屬辭，由辭顯義，故閱讀經由筆削編纂後之實事，經由比其事、屬其辭，其中有義，故可以「善惡自見」。清顧炎武《日知錄》所謂「于序事中寓論斷」（詳下），此中有之。

程端學《春秋本義》，再三提及張本繼末，原始察終之「屬辭本事」，以為

¹⁰¹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原序》，冊160，頁4。

可以「使人自見其義」，乃「《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傳播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遺憾「說《春秋》者，終莫之省」，於是《春秋本義·通論》頗闡說「屬辭比事」之解經法，如云：

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大凡《春秋》一事為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自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可救者，往往皆是。¹⁰²

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夫《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¹⁰³

「爰始要終，本末悉昭」，以詳為尚，乃古春秋記事之成法。¹⁰⁴《春秋》本記事之書，既經孔子筆削措注，又分年書事，故事跡斷裂不貫。治《春秋》者，當運以屬辭比事之法，自「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如此，「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自重」，可以考察得知。據程端學觀察：「《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比事者也。」¹⁰⁵於是以宏觀視角，提出系統思維，有所謂「大屬辭比事」，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跡而比觀之；所謂小屬辭比事，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於是得知弑君有漸，滅國有漸，絕非一朝一夕之故。今持「爰始要終，本末悉昭」之屬辭比事手法，以觀《春秋》之漸化頓變，如網在綱，將可以經明經，無傳而著。清孔廣森治《公羊》學，其《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云：「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¹⁰⁶善哉斯言也！

元趙汭《春秋師說》稱：「說《春秋》，當求事情」；「學者須以考事為先；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精旨者也」；¹⁰⁷孔子謂：「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據

¹⁰²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通論》，冊160，頁34。

¹⁰³ 同前註。

¹⁰⁴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第3冊，《左盦集》，卷2〈古春秋記事成法攷〉，頁1，總頁1445。

¹⁰⁵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卷4，冊160，頁91

¹⁰⁶ [清]孔廣森：《孔檢討公羊通義》，輯入[清]阮元主編：《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卷691〈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頁7，總頁9293。

¹⁰⁷ [元]趙汭：《春秋師說》，《通志堂經解》本，卷下〈論學春秋之要〉，頁3、4，總頁

事可以案斷，理在事中故也。依據《春秋》史事之編比，可以考求其中之微辭隱義，《春秋師說》提示最爲剴切，如：

《春秋》本是記載之書，記事而提其綱，要以著得失、明大義也。學者只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¹⁰⁸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只就史字上看，便見《春秋》是紀事之書。學者須以考事爲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疏矣。夫考事已精而經旨未得，尚多有之；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經旨者也。又須先曉史法，然後可求書法。史法要精熟，書法要委曲，求合于中。¹⁰⁹

《春秋》固是經，然本是紀事，且先從史看。所以如此說者，欲人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事情既得，書法既明，……則《春秋》始可通。¹¹⁰

黃澤從源頭上看待《春秋》，論其性質成份，以爲本是記載之書：「《春秋》是事，須先考事實，而後可以求經旨」。趙汭演述其師黃澤之《春秋》學，以爲欲得經旨、推校書法、求聖人筆削之旨，當以考事爲先。必先考索事情、考據事實，然後人物之得失見，《春秋》之大義明。汪克寬（1304-1372），幾與趙汭同時，著有《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爲明永樂中胡廣（1370-1418）等纂修《春秋大全》之祖本。虞集序胡書有云：「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附會糾纏之失矣。」汪克寬亦言：「竊嘗伏讀聖人之經，一事之筆削，一言之增損，一字之同異，無非聖心精微之攸寓，而酌乎義理之至當。」¹¹¹虞、汪二氏亦皆關注史事筆削，與直書見義。

趙汭著《春秋屬辭》十五卷，受其師黃澤「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之啓發，於是揭示筆削之旨，以推求《春秋》之義，若論其策略要領，則在屬辭比事之法，其自序云：

14944。

¹⁰⁸ 同前註，頁2，冊26，總頁14943。

¹⁰⁹ 同前註，頁4，總頁14944。

¹¹⁰ 同前註，頁5，總頁14945。

¹¹¹ 〔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首，〔元〕虞集〈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原序〉，頁2；汪克寬〈凡例〉案語，頁3；冊165，總頁3、8。

《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弟子高弟者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為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義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¹¹²

所謂筆削，指對魯史所載事跡作或取或捨、或詳或略之篩選；斷截之際，別識心裁、好惡予奪已寓存於其中。義存乎事，事見乎文，故趙汴稱：孔子作《春秋》，「與述而不作者事異」，弟子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亦由於此。屬辭比事之法，教人考求事跡之異同，以見筆削之意，最有功於《春秋》之詮釋解讀。其中，假筆削以行權，若事有非常，情有特異，則出以變文與特筆。其呈現方式，亦不離「義存乎事」，而「事見乎文」。

（二）明清《春秋》學與比事見義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凡一萬六千餘言，載一千八百餘事。其間，事件單純，即起即止，未有後續發展者極少，如《春秋》書「梁亡」（僖公十九年）、「滅項」（僖公十七年）之類，欲知《春秋》書法，必須仰賴《左傳》提供本事，是非榮辱，方可案斷，此不可「獨抱遺《經》，無傳而著」者，一也。清顧棟高稱：「《春秋》有只一書以見義者」，此不必屬辭比事，而自然可知者，¹¹³二也。如《春秋》書「子同生」（桓六）、肆大眚（莊二十二）、鄭棄其師（閔二）、成宋亂（桓二）、宋災故（襄三十）、王室亂（昭二十二），此皆「終《春秋》不再見」，只記一事，自為始終，自為本末，故無庸屬辭比事，其義易見，故《左傳》亦闕其本事。上述二者，前者不能「無傳而著」；後者可以無傳，其義自明，皆無勞屬辭比事以見義。因此，屬辭比事所以為《春秋》教者，指《春秋》文字，有屢書、再書、不一書方能見義者。或比事見義，或即辭觀義，或探究終始，要皆如此，方能見《春秋》之取義。

明湛若水《春秋正傳》，深受黃澤、趙汴之啟發。湛若水以為研治《春秋》，「當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¹¹⁴考

¹¹² [元] 趙汴：《春秋屬辭》，頁 14677。

¹¹³ [清]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首〈讀春秋偶筆〉，頁 30。

¹¹⁴ [清] 紀昀主纂：《四庫全書總目》，卷 28〈經部·春秋類三〉，[明] 湛若水《春秋正傳》提要，頁 24，總頁 582。

索事情，以推校書法，或有得於黃澤之啓示，其言曰：

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人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竊取之意存乎經傳，以傳實經，而斷案見矣。譬如今之理獄者，其事其斷一一存乎案矣。聖人之經，特如其案之標題，……而是非之詳自見於案也。故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紫陽朱子曰：「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此其幾矣。……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大其心以觀之，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得矣。¹¹⁵

揣度聖人之心，推求《春秋》之義，爲研治《春秋》之大節目；揣度推求有方，考之於行事，即事可以明義。蓋「聖人之心存乎義，聖人之義存乎事」；而其事，則「詳乎魯史之文」。憑其辭文，考其行事，《春秋》之取義可得而求。其中環節，端在其事之類比、對比與比況。故湛若水稱：「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湛若水說《春秋》事與義之關係，舉理獄之事案與判斷爲喻：以「是非之詳」、「以傳實經」、「觀傳知義」、「直書其事」觀之，《三傳》中較主《左傳》事實可知。據此言之，《左傳》說經，出之以歷史敘事，故朱熹《春秋》綱領，稱「《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故曰：「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¹¹⁶從朱子之《春秋》觀、《左傳》觀，湛若水《春秋正傳》之考事得義，知據實、考事乃解讀《春秋》書法之一大法門，與屬辭表述可以相得益彰。

明季本（1485-1563）著《春秋私考》三十六卷，《四庫全書總目》稱其不信三傳，乃至於杜撰事蹟，改易舊文，有講學家恣橫之病。¹¹⁷雖然，其說《春秋》，亦間有可採者，如自序稱孔子作《春秋》：「提綱舉要，刪削而敘正之，具文見意，無所容心，但使是是非不泯其實而已」；「聖人作經，本以明是非之心，其

¹¹⁵ [明]湛若水：《春秋正傳》，卷首〈自序〉，頁1-2，冊167，總頁39-40。

¹¹⁶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83〈春秋綱領〉，頁2151-2152、2148。

¹¹⁷ [清]紀昀主纂：《四庫全書總目》，卷30〈經部·春秋類存目一〉，《春秋私考》提要，頁11，總頁620。

所刪削莫重於文奸惑世之言」云云。所謂具文見意，不泯其實，即所以明是非之心、闡發《春秋》之義。又如：

不書葬，《左氏》以為不成喪，是也。不成喪，則亂賊肆為邪說。不君其君，故不訃於諸侯。不以禮葬，而諸侯不來會矣。……故凡不書葬者，皆據其不以禮葬之實，而義自見矣。¹¹⁸

凡弑君之賊，多歸惡於君，未有自以為弑者，故制其國命，抑不成喪，不以訃於諸侯，而諸侯亦不遣使奔喪會葬。如……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如此，則《春秋》乃作意為之，豈信以傳信邪？此皆據實而書，聖人何容心哉？¹¹⁹

據實事而直書，為《春秋》五例之一，所謂盡而不汙，是非善惡自見。季本說《經》，既強調「具文見意，不泯其實」，故解讀《春秋》載隱公見弑，書「公薨」，乃類推為「凡不書葬者，皆據其不以禮葬之實」；既不成喪，據實書寫，於是「義自見矣」。又於《春秋》書「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發凡起例，謂弑君之賊，多「制其國命，抑不成喪，訃於諸侯，而諸侯亦不遣使奔喪會葬」，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此之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學之存真、實錄，《春秋》之筆削去取，此中有之。誠如季本所謂「此皆據實而書」，孔子無所容心，而是非褒譏，自在言外。

明姜寶（1514-1593）著有《春秋事義全考》十六卷，闡發筆削之微旨，立名教之大防。其說《春秋》也，強調「因文求事、因文與事以求義」，蓋兼其事、其文而論之，故標榜直書見義，有所謂「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其自序《春秋事義全考》頗闡發《孟子》述孔子作《春秋》，所謂其事、其文、其義三元素之內涵，不厭其詳，如云：

夫聖人因史為文，文在也，而事與義往往多失之。……事貴詳貴核，詳且核，又貴連絡而通貫。……而謂之竊取，蓋其寓褒貶於筆削，不惟游夏所

¹¹⁸ [明]季本：《春秋私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3，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頁22，總頁44。

¹¹⁹ 同前註，卷31，昭公十九年〈冬，葬許悼公〉，頁5-6，總頁387-388。

不能贊，即聖人亦不敢抗然自任矣。義在褒善貶惡，而經世之法，如所謂尊君父、討亂賊、……蓋多直書而義自見。即有筆削，其褒貶亦多於直書中概見焉。初未嘗因一字以求一義，予人以爵，奪人以爵，……如胡氏所云，是又有待於後之人因文求事，因文與事以求義。要之，至當求其精蘊之所在，而兼亦有以考其全也。¹²⁰

《春秋》之作，包涵其事、其文與其義之創意組合。明姜寶《春秋事義全考》有感於《春秋》因史爲文，「文在也，而事與義往往多失之」，故以「全考」命其書。事實詳核，又貴連絡通貫，欲考據史事，非排纂編比其事不能。《春秋》既「因史爲文」，此胡安國《春秋傳》所謂「孔子因事屬辭」，故比事可以觀其義，此非比事屬辭不爲功。姜寶本《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注「盡而不汙」，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義」，因而強調「直書見義」，以爲《春秋》褒貶之義，「亦多於直書中概見焉」。於是主張「因文求事」，「因文與事以求義」，實不離《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之治《經》要領。姜寶既標榜「因文與事以求義」，故批評胡安國《春秋傳》之「因一字以求一義」，不贊同因名字作予奪褒貶。《朱子語類》載錄朱熹之說：「《春秋》只是直截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¹²¹姜寶之論，與朱熹之說，見解不異，可以相互發明。

明高攀龍（1562-1626）著《春秋孔義》十二卷。治《春秋》斟酌《四傳》，主於以經解經，「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¹²²綜考高攀龍《春秋孔義》，比類其事，合察其辭以見義者，近二十例，皆以經解經之法，如：

¹²⁰ [明]姜寶：《春秋事義全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春秋事義全考序〉，冊169，總頁84。

¹²¹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83〈春秋綱領〉，頁2144-2145。

¹²² [清]紀昀主纂：《四庫全書總目》，卷28〈經部·春秋類三〉，《春秋孔義》提要，頁36，總頁588。

十二公多歷年所，豈無豐年？而獨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何也？桓弑君而立，宣為弑君者所立，皆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災，而乃有年，是反常也，故紀其異。¹²³

《春秋》書滅國，未有如此其暴者：書誘、書殺、書圍、書執、書用，聖人傷中國之微，而荆楚之暴也。¹²⁴

《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間，自有豐年、大有年。基於常事不書，非常乃書之書法原則，桓公四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類比其事，連屬其辭，通全經而考察之，故《春秋孔義》以為「反常」、「紀異」。夷夏之防，為《春秋》大節目，荆楚之消長侵伐，最所關注，《春秋孔義》考察《春秋》經昭公十一年記事：「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再考「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七月之內，楚之於蔡，誘之、殺之、圍之、執之、用之，無所不用其極，《春秋》據實直書，比其事類而見孔子之取義，高攀龍謂「聖人傷中國之微，而荆楚之暴也」，具文見事，比事可以觀義，殆近之。

孔子《春秋》之取義，既寓存於行事之中，故考察行事，可以索解孔子之取義。清顧炎武《日知錄》曾言：「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¹²⁵此即事顯義，以事為議之說也。清張自超本朱熹據事直書之旨著《春秋宗朱辨義》，啓迪方苞之《春秋》學，其〈總論〉有言：「《春秋》紀事之書也，而義即在乎事之中。苟攷於事不得其實，則索其義有不可以強通者矣。」¹²⁶皆是具文足以見其義，即事可以顯其義之論證。孔子傳承舊史，而未加損益，於是《春秋》或直書其事，因之未改。

清毛奇齡著有《春秋傳》三十六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毛氏《春秋屬辭比事記·自序》，於屬辭與比事之釋名，精確概括，通達圓融，說已見前。其說比事，以為「史官所載之事，畔亂參錯而當為之比以類也」；又謂：「事之

¹²³ [明]高攀龍：《春秋孔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桓四年「冬，大有年」，頁5，冊170，總頁11。

¹²⁴ 同前註，卷10，昭公十有一年〈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頁14，冊170，總頁124。

¹²⁵ [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頁1429。

¹²⁶ [清]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卷首〈總論〉，頁4。冊178，總頁4。

相似者，而褒譏功罪見焉；即不相似者，而褒譏功罪亦無往不見焉」，¹²⁷相似者以類比，不似者以對比；類比者，以正襯；對比者，以反襯。事跡無論似或不似，經由全《經》之排比，相互襯托，褒譏功罪遂見於言外。毛奇齡《春秋傳》亦頗發明比事見義之說，如：

《春秋》須詳審《經》文，備究其事之始末，並當時行事之首從、主輔，而後可斷以義。否則，鮮有不誤者。¹²⁸

孔子作《春秋》，其憂危經世之志可見，故治《春秋》者，可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毛奇齡提示解《經》之三部曲：其一，須詳審《經》文；其二，備究其事之始末；其三，考察「當時行事之首從、主輔」。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稱：「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孔子《春秋》既「因事屬辭」，故斷定《春秋》之義，排比相關事跡，可以見出微辭隱義。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提出《春秋》四例，其二曰事例，所謂「就事而計其寡多，較其大小輕重，而是非可驗。」¹²⁹於名實輕重、內外小大之際，交相較量，而進退褒貶已現於言外。故曰：直書不諱，而是非功過自在其中。

清萬斯大（1633-1683）著《學春秋隨筆》十卷，往往持「比事屬辭」以解說《春秋》。如「《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治』，繼書『陳夏徵書弑其君』，繼書『楚子入陳』，以著為君不道而殺諫臣，必至于身殺國亡，為後鑒也。」¹³⁰此以比事見義，探究終始，考見《春秋》之「何以書」也。萬斯大以「屬辭比事」之《春秋》教，考求《春秋》之義，《春秋》經隱公四年所書，最稱詳切。《學春秋隨筆》稱：

¹²⁷ [清]毛奇齡：《春秋屬辭比事記》（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皇清經解》本），卷158〈春秋屬辭比事記·自序〉，頁1，總頁7957。

¹²⁸ [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皇清經解》本），卷8，頁24。

¹²⁹ [清]毛奇齡：《毛檢討春秋傳》，[清]阮元編：《皇清經解》，卷120，卷首「二曰事例」，頁9，總頁7673。

¹³⁰ [清]萬斯大：《學春秋隨筆》，阮元主編：《皇清經解》（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卷56〈（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洩治〉，頁4，總頁792。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於是年尤切。所謂比事者，《經》書「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弑州吁」，有以見亂賊肆逆，惡黨眾盛，衛人討賊之難；謀老算深，雖久而終殺之也。書「九月，衛人殺州吁」，「十二月，衛人立晉」，又以見衛之立君遲回慎重，晉無覬覦之嫌，衛人無黨暱之私，尸其事者石碏，同其欲者眾人，故兩書衛人，以昭公義，此比事而見之也。¹³¹

所謂屬辭者有二：《春秋》書立者再見，於晉，曰「衛人立晉」，足知一國之公也；于朝，曰：「尹氏立王子朝」，足知一族之私也。……聖人究觀終始，……爰大書特書曰：「衛人立晉」，以見繼弑者非討賊不可為君，非得眾不可為君，此屬辭而見之也。¹³²

萬斯大理解《春秋》教，析分「所謂比事者」、「所謂屬辭者」二類，可見「比事」與「屬辭」，為獨立不倚，可以分割之兩個詞組，然彼此又有主從、重輕之內在連繫。孔子《春秋》，於衛州吁之見弑，欲表述「亂賊肆逆，惡黨眾盛」之「義」，於是排比是年二月、夏、秋、九月四條相關事跡，於是藉比事可以見義；且石碏之謀算，「雖久而終殺」州吁，亦見於言外。《春秋》書「九月，衛人殺州吁」；又書「十二月，衛人立晉」，張本繼末，原始要終，於是衛人立君之慎重，眾人之同欲，多見於辭文之外；「兩書衛人」者，所以「昭公義」。凡此，皆可藉由比事，以見《春秋》之義，萬斯大舉例論證甚明。比事之外，《春秋》又往往即辭而觀義，其要領亦在「究觀終始」，通全《經》之辭而比其事。萬斯大發現：「《春秋》書立者再見」，不過，二事似同而實異，一則知一國之公，一則覬一族之私而已。萬斯大以為，《春秋》書「衛人立晉」，其言外之意，「見繼弑者非討賊不可為君，非得眾不可為君」，此由《春秋》之屬辭可得而知之也。

綜考歷代《春秋》學，有以敘事見義者，實即杜預《注》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前所徵引，於此多所闡發。至於如元程端學、趙汭所謂「大屬辭比事」、「小屬辭比事」；「考究前後、異同、詳略」；方苞《春秋通論》所謂「按

¹³¹ 同前註，卷 50（（隱公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頁 15，總頁 768。

¹³² 同前註。

全《經》之辭，而比其事耳」（詳後），又可分爲一類。除此之外，清代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讀春秋偶筆〉，於比事見義，論述尤其透徹，如云：

《春秋》有只一書以見義者，如子同生、肆大眚、鄭棄其師、成宋亂、宋災故、王室亂，終《春秋》不再見。此聖人之特筆，不必屬辭比事而可知也。有屢書、再書、不一書以見義者，如桓五年……至莊四年……首尾十七年，書紀凡十四事，著齊首滅國，而紀委曲圖存終不得免，憫紀之亡而傷齊之暴也。桓三年，……至冬，……一年之中連書六事，皆為昏文姜。莊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三年之中連書十四事，皆為昏哀姜。志閭門之禍，謹履霜之漸，詔天下後世以閑有家之道也。自桓十八年……至莊元年……兩年之中連書九事，志魯桓之見稱殺於齊，而魯吞聲飲恨為可憐而可痛也。自莊二年，……至莊八年，……七年之中連書凡十七事，志齊襄之淫慾，夫人之無恥，而魯莊之忘父事仇，縱毋淫奔，更會授會伐以取媚，至元兇就殛而後已，為悖天而逆理也。自莊九年，……自十三年，……五年之中連書凡十一事，志莊公之忘父仇而欲定仇國，納子糾，又見殺，與齊為難，至桓公定伯而後已也。自僖十七年……至二十七年，……首尾十一年，連書三十四事，志宋襄嗣伯無功，荊楚暴橫莫制，諸夏瀾倒，汲汲有左衽之憂，而晉文之出為刻不可緩也。此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時勢，真如枯旱之望雨，聖人之意自曉然明白於字句之外。而豈一字兩字，稱人稱爵為褒貶哉！¹³³

顧棟高以為：《春秋》有以一書見義者，乃聖人之特筆，不必比事屬辭即可知，此種書例較少。《春秋》為推見至隱，往往以「屢書、再書、不一書」以見義，此非排比前後事跡而觀察之，不足以見其旨義。顧氏〈讀《春秋》偶筆〉引述韓愈〈寄盧仝〉詩，稱：「『究終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屬辭之法，此最是看《春秋》之一法。」歷史發展之軌迹，既然遵循「有漸無頓」法則，因此孔子《春秋》亦強調慎始、謹漸。顧棟高列舉《春秋》事迹，謂「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時勢」，有三年之中連書十四事者，有七年之中連書凡十七事者，有五年之中連書凡十一事，有首尾十一年連書三十四事。治《春秋》者，皆當探究終始，通觀積漸。

¹³³ [清]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讀春秋偶筆〉，頁30-31。

如此，聖人作《春秋》之義，方能「明白於字句之外」。顧棟高持「通觀積漸」之比事手法，考察《春秋》所載弑君、滅國諸書例，亦怡然理順，如云：

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隱四年，書翬帥師，而十一年有鍾巫之禍。宣二年，書公子歸生帥師，而四年有解鼃之禍。宣元年，書趙盾帥師、趙穿帥師，而二年有桃園之禍。成六年、八年、九年，連書晉欒書帥師，而十八年有匠麗之禍，此起伏之在十年以內者。蓋弑君有漸，其大要在執兵權，不至弑君不止。滅國亦有漸，其大患在數侵伐，不至滅國不止。聖人灼見諸國之形勢，亂賊諸人之心事，而次第據實摹寫之，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¹³⁴

歷史事件之發展，必定依循「有漸無頓」之律則。宋呂祖謙《左氏傳續說·綱領》稱：「學者觀史，且要熟看事之本末源流，未要便生議論。」¹³⁵原始要終，本末悉昭，為古春秋記事成法；孔子《春秋》既有所紹述，治《春秋》者自當折衷於此。清顧棟高以為：「弑君有漸，其大要在執兵權，不至弑君不止」，如書翬帥師，後有鍾巫之禍；書公子歸生帥師，後有解鼃之禍；書趙盾、趙穿帥師，後有桃園之禍。凡此，起伏多在十年以內。仲尼因事屬辭，讀者就編纂排比之事跡而究其終始，是所謂比事以見義。推而廣之，「滅國亦有漸，其大患在數侵伐，不至滅國不止」，由漸化至頓變，比事屬辭，察其終始，自是研究《春秋》之要領。前乎此者，元程端學《春秋本義·通論》特提「有漸」之說，稱《春秋》載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¹³⁶顧棟高自歷史進程「有漸」，持以說《春秋》比事屬辭，殆受程端學啟發，而亦發揚光大之。

方苞著《春秋通論》四卷、《春秋直解》十二卷，為《春秋》學之姊妹篇。其《春秋通論·通例二章》云：「《春秋》因事屬辭，各得其實，而是非善惡無遁形焉。」《春秋》因事屬辭，由辭生義，其辭文或詳或略，於舊史或異或同，內辭曲筆諱書，外辭直書不諱，其中即寓含孔子竊取之「義」。方苞《春秋通論·

¹³⁴ 同前註，〈讀春秋偶筆〉，頁33-34。

¹³⁵ 〔宋〕呂祖謙：《左氏傳續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左氏傳續說·綱領〉，卷首，冊152，頁1，總頁144。

¹³⁶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通論》，冊160，頁34。

通例》批評「先儒褒貶之例多不可通」，問題關鍵出在：「以未嘗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耳」。¹³⁷考求《春秋》書法，排比全《經》之事跡，是其一法。

方苞治《春秋》，蓋持屬辭比事爲鎖鑰，以考求微辭隱義。其〈春秋通論序〉稱：「通前後而考其義例，則表裏具見」，意同於《春秋通論·通例》所謂「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其書名所以標榜「通論」，以此。〈春秋通論序〉又云：

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未由得其間也。¹³⁸

《春秋》之義既貫於全經，且又「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於是如何探索《春秋》之義，成爲歷代《春秋》學研究主軸之一。方苞以比事屬辭之法探索《春秋》之義：就《不脩春秋》（魯史記）而言，事跡之編比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若能「通全經而論之」，「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既經系統而宏觀之掌握，於是「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謂參互相抵，指參透、交互，彼此激盪，事同辭異，可以互發其蘊，自是比事屬辭之法。

方苞著成《春秋通論》，「以比事屬辭之義，分疏其條理，俾按以全經而始終相貫」。又懼初學者不明其端緒，於是更爲《春秋直解》十二卷，¹³⁹猶傳之於經，疏之於注也。《春秋直解》〈自序〉曾批評諸儒治經，不當「屈摺經義，以附傳事」；孔子之志存乎經，故雖去傳，以之求經，其義仍可探求。方苞現身說法，自序求《春秋》義之心路歷程：

¹³⁷ [清]方苞：《春秋通論》，卷4〈通例七章〉之一，頁17；冊178，總頁345。

¹³⁸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四部叢刊》初編本），卷4〈春秋通論序〉，頁4，總頁52。

¹³⁹ [清]方苞：《春秋直解》，卷首某〈序〉，總頁1。

余之始為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殽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眾說殽亂不安者，筆削之義每出於其間。

140

方苞治《春秋》，以筆削求《春秋》之義理。所謂筆削，兼指其事之去取，其文之損益而言。前文徵引方苞〈春秋通論序〉，曾云：「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謂參互相抵，即是比事屬辭法之形象描述。方苞治《春秋》，標榜「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就一部《春秋》之事之文，交互參透、相摩盪、相觸發，穿之鑿之，而《春秋》之義可以藉形傳神，即器明道。

清章學誠為乾嘉時期知名之文史評論學者。《文史通義》及《章氏遺書》於「比事屬辭」多所發揮，涉及史學、敘事、古文辭諸領域，尤其是《春秋》書法，堪作《文史通義》「《春秋》教」之補編。¹⁴¹其中有關比事屬辭者，選錄如下：

夫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載筆之士，有志《春秋》之業，固將惟義之求。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¹⁴²

考索孔子作《春秋》之旨義，為歷代治《春秋》學者之終極追求。苟欲求其義，則當據其事，憑其文；其事實、其文顯，則《春秋》之微辭隱義不難索解。猶即器明道，藉形傳神。章學誠稱：「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其相互依存，體用不二，有如此者。

「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此章學誠《校讎通義》〈論修史籍考要略〉之言。《文史通義》〈答客問〉則云：「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¹⁴³此章氏經史相通、文史相濟之論點。推此而言，章氏論學遂以為：史學、敘事、古文辭，皆源本於比事屬辭之《春秋》教，如云：

¹⁴⁰ 同前註，〈自序〉，頁3。

¹⁴¹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章學誠之《春秋》教：史學、敘事、古文辭與《春秋》書法〉，《中山人文學報》第36期（2014年1月），頁31-58。

¹⁴²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四〈言公上〉，頁107。

¹⁴³ 同前註，《校讎通義》外編〈論修史籍考要略〉，頁642；《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上〉，頁138。

古人著述，必以史學為歸。蓋文辭以敘事為難，今古人才騁其學力所致，辭命議論，恢恢有餘；至於敘事，汲汲形其不足，以是為最難也。……然古文必推敘事，敘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屬辭」。¹⁴⁴

章學誠論史學、論敘事、論古文辭，皆歸本於「比事屬辭」之《春秋》教。如「敘事之文，出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也」；¹⁴⁵「史家敘述之文，本於《春秋》比事屬辭之教」；「敘事之文，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古無史學，其以史見長者大抵深於《春秋》者也。」¹⁴⁶換言之，「屬辭比事」之《春秋》教，影響層面深遠而廣大，敘事、史學，要皆其苗裔，要皆據事、憑文，以推求義旨者。

除了敘事、史學之外，深受「比事屬辭」沾溉之文體，尚有古文辭。章學誠以為：古文辭也者，古人謂之屬辭。一般而言，《春秋》學中之屬辭，多涵蓋比事；分言有別，單舉則并包。章學誠云：

古文辭蓋難言矣。古人謂之屬辭，不曰古文辭也。《記》曰：「比事屬辭，《春秋》教也。」夫比，則取其事之類也。屬，則取其言之接續也。紀述文字取法《春秋》，比屬之旨，自宜遵律。顯而言之，昌黎所謂文從字順是也。¹⁴⁷

方苞〈又書〈貨殖傳〉後〉說義法，有所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而所稱「言有序」之「法」，即兼指事跡之筆削，辭文之修飾而言。¹⁴⁸章氏再三強調，比事屬辭與古文有其關聯性。古文辭之中，如史傳文、碑誌文、雜記文，其義往往藉由

¹⁴⁴ 同前註，外篇三〈上朱大司馬論文〉，頁308。

¹⁴⁵ 同前註，外篇三〈與汪龍莊書〉，頁328。

¹⁴⁶ 〔清〕章學誠：《章氏遺書》，外編卷1〈信摺〉，頁836。《章氏遺書補遺》〈論課蒙學文法〉，頁1358-1359；〈史考釋例〉，頁1378。

¹⁴⁷ 同前註，卷29，外集2〈論文示貽選〉，頁75，總頁752。

¹⁴⁸ 〔清〕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初編本），卷2〈又書〈貨殖傳〉後〉云：「《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蹟而不可惡也。」頁20，總頁40。

其辭、其文，而推求得來。辭文之連屬，事跡之編比，可以形塑人物性情，體現褒貶勸懲。故章氏〈論文示貽選〉一文重之，所謂「記述文字取法《春秋》，比屬之旨，自宜遵律。」此辨體之說。關於術語訓解，章學誠所云，頗有可取。所謂「比，則取其事之類也；屬，則取其言之接續也」。換言之，編比類纂事跡，鏈接賡續辭文，自是《春秋》教之功。由此觀之，辭文之連屬、事迹之排比，自是史學之指南，敘事之津筏，古文辭之關鍵，更是《春秋》書法求義之重要法門。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詔徵求圖書，著手編修《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1724-1805）等，為便利皇帝閱讀參考，乃有「提要」之作。細讀《四庫全書總目》，四庫館臣於《春秋》、《三傳》，較傾向比事見義，推崇《左傳》之以史事傳經，如：

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¹⁴⁹

《四庫》館臣批評啖助、趙匡、孫復、劉敞之流，「名為棄傳從經，所棄者特《左氏》事跡」云云；如此，將彌離其本，而微辭隱義不可得而求。蓋《春秋》之作，「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故史事為解經之根本，理應不離不棄。元趙汭《春秋師說》稱：「說《春秋》，必須兼考史家記載之法，不可專據經文也」；又云：「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為主，然後可求書法。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末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¹⁵⁰趙汭述其師黃澤《春秋》經說，影響《四庫》館臣有關「《春秋》類」經籍之系統論述，所謂「藉《左氏》以杜臆說」云云，皆有得於比事見義，《左傳》於《春秋》為近：

《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為《傳》，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蹟，雖聖

¹⁴⁹ [清]紀昀主纂：《四庫全書總目》，卷28〈經部·春秋類三〉，[明]湛若水《春秋正傳》提要，頁24，總頁582。卷26〈春秋類一〉，頁1，總頁536；「春秋左傳正義」提要，頁4，總頁537。

¹⁵⁰ [元]趙汭：《春秋師說》，卷上〈論魯史策書遺法〉，頁8，總頁1492；卷下〈論學春秋之要〉，頁4，總頁14944。

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

151

據《漢書·藝文志》，《春秋》屬於六藝，而司馬遷《史記》列入《春秋》家。劉歆《七略》以前，經史混而未分。錢穆〈孔子與春秋〉一文云：「《春秋》，還是一部亦經亦史的一家言。」¹⁵²又曰：「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即為史學上之問題」；「治經終不能不通史」。¹⁵³比事，考察歷史事跡如何排比編纂？主要體現為史家之筆法。雖攸關史學，更是《春秋》經學之主要課題。無論作《春秋》，讀《春秋》，皆不能無案而斷。古史記事成法，「具載一事之始末」，孔子藉以筆削，而《春秋》得以具事見義。具載事蹟，不但可以觀始末、資考證，更有助於定是非、示褒貶。

清孔廣森，為乾隆間進士，博覽群經，尤長於《春秋公羊傳》，著有《春秋公羊通義》十二卷。孔廣森治《公羊傳》，深受常州莊存與《春秋正辭》影響，志在闡揚《春秋》之微言大義。同時，頗持「屬辭比事」之教，以解讀《春秋》，曾云：「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自敘《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云：

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繫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以《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矣。¹⁵⁴

《春秋》，為孔子據魯史記而作。魯春秋，為史；孔子所修所作，其事跡經筆削取捨，其辭文經損益修飾，其中寓含獨斷於一心之別識心裁，所謂「義則竊取之」，是為《經》。孔廣森稱：「《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繫義」，無論《公羊》家之借事明義，或《春秋》家之比事見義，義皆不憑虛而生。清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不云乎：「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今孔廣森推拓《公羊》學「以義說經」之傳統，欲憑空「求《春秋》之義」，而非議學者「求《春秋》之事」。

¹⁵¹ [清]紀昀主纂：《四庫全書總目》，卷 28〈經部·春秋類三〉，[明]湛若水《春秋正傳》提要，頁 24，總頁 582。卷 45，史部，正《春秋》史類一，「史部總敘」，頁 958。

¹⁵²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孔子與春秋〉，頁 317。

¹⁵³ 同前註，〈自序〉，頁 6。

¹⁵⁴ [清]阮元主編：《皇清經解》，卷 691，[清]孔廣森：《孔檢討公羊通義》〈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敘〉，頁 3，總頁 9291。

綜觀《春秋》學史，筆者頗不然其說。孔廣森治《公羊春秋》，自云：「辭不屬不明，事不比不章」；¹⁵⁵既言「事不比不章」，如果學者通過「《春秋》之事」之考據把握，自有助於推求《春秋》之義。批評據比事解經者，以爲「視聖經，竟以《左氏》記事之標目，名存而實亡」，立說未免偏頗，不合實情。

以歷史敘事闡發孔子《春秋》之微辭隱義，不特《左傳》如此，《公羊傳》、《穀梁傳》亦不乏以敘事解經之例。唯《公羊》、《穀梁》較偏重以義理解經，往往忽視敘事解經於《二傳》之功能。清皮錫瑞（1850-1908），爲晚清知名《春秋》學者，專主《公羊》學，所著《經學通論·春秋》，有專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一文，可作《公羊》學敘事見義之代表，如云：

借事明義，是一部《春秋》大旨。……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錫瑞案……此二語看似尋常之言，有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必明於《公羊》借事明義之旨，方能解之。蓋所謂見之行事，謂託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貶之義也。……

如魯隱非真能讓國也，而《春秋》借魯隱之事，以明讓國之義。祭仲非真能知權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權之義，齊襄非真能復讐也，而《春秋》借齊襄之事，以明復讐之義，宋襄非真能仁義行師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義行師之義。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蓋是如此。故其所託之義，與其本事不必盡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義，使後之讀《春秋》者，曉然知其大義之所存，較之徒託空言而未能徵實者，不益深切而著明乎？¹⁵⁶

皮錫瑞標榜「借事明義」，作爲一部《公羊春秋》學之大旨，可謂有理有據，持論平正。蓋《春秋》之微言大義，在由筆削見褒貶，故《春秋》因筆削去取，選出代表人物，體現典型事跡，如魯隱讓國、祭仲知權、齊襄復讐、宋襄仁義行師等等。所以然者，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義」，而《春秋》可以「託二

¹⁵⁵ 同前註，頁7，總頁9293。

¹⁵⁶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1995年），四、〈春秋〉，〈論《春秋》借事明義之旨……〉，頁21-22。

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貶之義」，由此觀之，「借事明義」，果真是一部《春秋》之大旨。《公羊傳》隱公二年，特提《春秋》「託始」之文，於是《公羊》家往往言託文見義，作為《春秋》「如何書」之總原則。託文見義，或稱借事明義、因事見義、因事託義、因文見義。¹⁵⁷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史德》稱：「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¹⁵⁸無論稱為託文見義或借事明義，皆指假託實事，以明褒貶，此皮錫瑞上承董仲舒、司馬遷之成言，而作創造性之詮釋者，誠有功於《春秋》學之發揚。

日本安井衡（1799-1867），為日本江戶時期儒學之集大成者。安井衡發現《左氏》解經，多寓聖意於序事之中，致前賢錯會，以為《左氏》詳於事而淺於經。於是著成《左傳輯釋》二十五卷，持屬辭比事以解經，孔子竊取之義可見。安井衡自序《左傳輯釋》云：

《左氏》之解《經》，五十凡之外，每寓於序事之中。細繹其文，其義始顯。固不如《公》、《穀》句釋字解，淺露易見，以故讀者不曉耳。雖然，《左氏》豈故為隱晦難曉之解，以徵其道哉？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不如此不足以暢經旨也。……杜氏之……釋《傳》，不曉經義寓於序事中，又喜廢詁訓以逞臆說，是以劉炫以下，起而攻之者，無慮數十家。

159

《左傳》以歷史敘事解《經》，敘事見本末，因以求義，《經》文可知。元趙汭《春秋師說》稱：《春秋》本是記載之書，「學者只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未有考事不精，而能得精旨者也」。安井衡發現：《左氏》之解《經》，「每寓於序事之中，細繹其文，其義始顯。」此即顧炎武《日知錄》所謂「于序事中寓論斷」之法；簡言之，敘事可以見義，比事可以示義。安井衡以為：杜預注《左傳》，「不曉經義寓於序事中」，故說解多乖誤。¹⁶⁰而所謂序事，或作敘事，蓋指比事、

¹⁵⁷ 林義正：《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年），緒論第二節〈《春秋》之辭的書法分析〉，11、「託文見義」，頁28-29。

¹⁵⁸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史德〉，頁149-150。

¹⁵⁹ 〔日〕安井衡：《左傳輯釋》（臺北：廣文書局，1967、1979年），卷首〈自序〉，頁3。

¹⁶⁰ 〔隋〕劉炫（546?-613?）著有《春秋規過》三卷，規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缺失，共150餘條。〔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引述達170餘條，蓋一條分置數處使然。

屬辭之合宜次序。唐劉知幾（661-721）《史通·敘事》稱：敘事之體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迹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¹⁶¹安井衡以爲：《左傳》解《經》，「《經》義寓於序事中」，大抵指劉氏所云之敘事四體而言。世儒治《經》，多知《左傳》敘事而已，不知《左傳》之敘事藝術正提供「考索事情，推校書法」之據依，所謂敘事可以見義。《左傳》解《經》，每寓於序事之中；安井衡舉《左傳》敘「晉侯召王」爲例，論證其說云：

衡案：《傳》釋此《經》曰：「是會也，晉侯召王」；又曰：「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然則河陽即溫。《傳》不書溫，而書河陽者，貶以臣召君之罪。《傳》義甚明，但《左氏》釋《經》，常寓於記事之中，以故人不喻爾。¹⁶²

僖公二十八年《經》：「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左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¹⁶³由此觀之，《左傳》解《經》，或同文見義，如「會于溫」；或特筆見義，如直紀其才行，稱「晉侯召王」，貶斥自在其中。引「仲尼曰」之敘事，是假讚論而自見；以臣召君之不倫，孔子損益其辭曰「天王狩于河陽」。實則溫與河陽，一地而二名；《左傳》釋《經》之書法，特筆見義，《經》義即寓存於記事之中。據此言之，日本江戶時期之《春秋》學，蓋紹述宋元而光大之，此自安井衡關注敘事見義，可以知之。

參考〔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收入《山東文獻集成》（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一輯第47冊第235種，〔隋〕劉炫：《春秋規過》，2卷，頁673-696。參考〔清〕皮錫瑞：《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七、〈經學統一時代〉：「劉炫規杜，多中杜失。」頁143；沈玉成等：《春秋左傳學史稿》，第七章第一節〈劉炫《述義》對杜注的疏通補正〉，頁170-174；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六章第一節〈隋代《春秋》學〉，頁262-264。

¹⁶¹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卷6〈敘事〉，頁168。

¹⁶² 〔日〕安井衡：《左傳輯釋》，卷6，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頁48-49，總頁742。

¹⁶³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卷16，頁30，總頁276。

就推求孔子《春秋》之取義而言，明清《春秋》學與宋元略有不同。北宋承中唐啖、趙疑傳信經之流風，往往尊經而不從傳，於是「獨抱遺經」，梳理史事之編比，致力辭文之修飾，以求其微辭隱義。明清《春秋》學薪傳宋元治經之心得，另闢蹊徑，凸顯會通適變之策略，轉而兼顧其事與其文之比屬，多側重系統化之論述。明姜寶標榜「事義全考」，清毛奇齡強調「備究始末」，顧棟高主張「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形勢」，章學誠提示「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因此，「比屬之旨，自宜遵律」。《四庫全書總目》拈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以推崇《春秋》經傳之敘事貢獻。《公羊》學家皮錫瑞亦凸出「借事明義」，而稱「託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貶」，此之謂見之行事。

要之，明清學者治《春秋》，與宋元有相似之處，皆在致力屬辭比事之闡說，以探討捨傳求經，無傳而著之可能。宋元《春秋》學，側重敘事見義，比事見義，而以屬辭為輔助；明清之《春秋》學，則會通比事與屬辭而一之，且回歸古春秋紀事之成法，致力張本繼末、探究終始之考索。比事屬辭之分疏與統攝，固《春秋》學史之關鍵課題，亦由此可見。

四、結語

廢棄《三傳》，獨抱《春秋》經，亦可以考察孔子之筆削去取，破譯《春秋》之微言大義。《禮記·經解》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就是以經解經，「無傳而著」之核心策略與通關鑰匙。王安石不信《春秋》，致詆為「斷爛朝報」。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如之何而可「無傳而著」？筆者綜考歷代《春秋》學之論著，研究之視角聚焦於屬辭比事，提出考求《春秋》之義之法門有三：其一，比事以見義；其二，屬辭以見義；其三，探究終始以見義。其義，猶形而上之道；其事、其文，屬形而下之器。即器可以明道，考察其事、其文，可以求得《春秋》之微旨隱義。總之，三者任擇其一，皆可以顯法相而明《春秋》之義。

歷代《春秋》學家，盡心致力處，當在考求《春秋》「都不說破」之「微辭隱義」，破解孔子別識心裁之「言外之意」。《孟子·離婁》、《禮記·經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已略作揭示：學者經由載事、修辭，可以考求《春秋》寄寓之「義」，猶即器以明道，順指而得月。誠如章學誠〈答客問上〉所稱：「《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事具始末，為比事之功；文成規矩，為屬辭之法，而詳略、異同、重輕、忽謹、隱晦、曲直、

先後、虛實之斟酌與安排，即爲比事與屬辭之加乘，而體現爲「獨斷於一心」、「成一家之言」之別識心裁。此之謂「筆削之義」、「昭乎筆削」。

北宋自孫復《春秋尊王發微》、劉敞《春秋傳》、《春秋權衡》，趙鵬飛《春秋經筌》，或盡廢三傳，或不盡從傳。於是兩宋治《春秋》者，或信《經》疑《傳》，大抵遠紹中唐啖、趙學派之「獨抱遺《經》」，企圖以經明經，無傳而著。其中持論平正通達，折衷於比事屬辭者，亦爲數不少，如程頤《春秋傳》、蘇轍《春秋集解》、胡安國《春秋傳》、葉夢得《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讖》；葉適《習學記言》、沈棐《春秋比事》、趙鵬飛《春秋經筌》、呂大圭《春秋或問》、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等諸家，治《春秋》多能考據事實，不爲廢傳求經之高論。所謂據敘述史事以見義，堪稱尊經抑傳之時代主潮。

兩宋《春秋》學主潮，在尊奉《春秋》經，以「獨抱遺經」，敘事見義爲主軸。如程頤所言：「因其行事，是非較著」；蘇轍所謂「《春秋》之事，當從史」；胡安國稱：「仲尼因事屬辭，智者即辭以觀義」；葉夢得云：「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事義更相發明」；沈棐曰：「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庶幾可「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朱熹以爲「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見」；趙鵬飛強調《春秋》「核其實而書之」；呂大圭亦主張「得事之實，而是非邪正爲不誣」。若此之類，皆傾向藉事跡敘述，而體現《春秋》之微辭隱義。相較之下，元代《春秋》學爲轉型期，如黃澤、程端學、趙汴等所著《春秋》論著，大抵漸從獨「抱遺經」之經典詮釋，轉型到探「究終始」之系統會通。如趙汴《春秋師說》、程端學《春秋本義》、趙汴《春秋屬辭》、湛若水《春秋正傳》、姜寶《春秋事義全考》諸作，要皆溯源到「爰始要終，本末悉昭」之古春秋記事成法，會通比事與屬辭，而以「究終始」爲治《春秋》學之重點。由此觀之，元代《春秋》學，堪稱上承兩宋下啓明清之分水嶺。

就《春秋》學研究史而言，學者推求孔子《春秋》之取義，明清《春秋》學與宋元略有不同。北宋承中唐啖助、趙匡疑傳信經之流風，往往棄傳從經，或尊經而不從傳，於是「獨抱遺經」，梳理史事之編比，辭文之修飾，以求其微辭隱義，成爲宋元儒者治《經》之主潮。明清《春秋》學薪傳宋元治經之心得，另闢蹊徑，凸顯會通適變之策略，轉而兼顧其事與其文之比屬，蓋回歸「原始要終，本末悉昭」之古春秋記事成法，多側重屬辭比事宏觀而系統化之論述。

明姜寶標榜「事義全考」，清毛奇齡強調「備究其事之始末，而後可斷以義」；萬斯大以爲「聖人究觀終始」，故說經或以比事見義，或以屬辭見義。顧棟高主

張「須合數十年之通，觀其積漸之形勢」，以「通觀積漸」之比事手法為經解。方苞以為：求義之法，在「按全《經》之辭而比其事」；「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章學誠提示「其事與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因此，「比屬之旨，自宜遵律」。孔廣森揭示：「辭不屬不明，不比不章」；惜主以義說經，而疏於「求《春秋》之事」。《四庫全書總目》拈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以推崇《春秋》經傳之敘事貢獻；《公羊》學家皮錫瑞亦凸出「借事明義」，而稱「託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褒貶」，此之謂見之行事。日本安井衡治《左傳》，以為《經》義「每寓於序事之中。細繹其文，其義始顯。」蓋結合其事、其文以求義。要之，明清治《春秋》，與宋元有相似之處，在致力於屬辭比事之闡說，以探討捨傳求經，無傳而著之可能。

藉史事之對比類比、辭文之連屬損益，以推求《春秋》之微辭隱義，此之謂「比屬觀義」。乃捨傳求經，不流於臆測之求「義」法門。孔子筆削魯史，而作《春秋》，其獨斷別識多隱寓於文之所不見。雖然「義」在言外，都不道斷說破；唯其事其文，「所以藉為存義之資」者，可以考求。西方之詮釋學，關注語言之傳達、翻譯、說明、解釋。就《春秋》之詮釋學而言，往往可以獲得彌縫、補足、擴充、開新之效益。傅偉動提倡創造的詮釋學（Creative Hermeneutics）五大層次，當可擴延其適用功能，到一個思想的延續、繼承、重建、轉化或現代化等等廣義的詮釋學課題。韋政通《董仲舒》，得傅偉動啟示，於是提倡「應以創造的解釋學來研究《春秋》」。可再參考言與意、器與道之辯證，以探論《春秋》之經典詮釋，請俟異日。

引用文獻

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本。

王夫之：《船山全書》，長沙：岳麓書社，1996年。

王基倫：〈《春秋》筆法的詮釋與接受〉，《國文學報》第39期，2006年6月，頁1-34。

毛奇齡：《春秋毛氏傳》，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皇清經解》本。

——：《毛檢討春秋傳》，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皇清經解》本。

——：《春秋屬辭比事記》，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皇清經解》本。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初編本。

——：《望溪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四部叢刊》初編本。

——：《春秋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春秋直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本。

孔廣森：《孔檢討公羊通義》，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皇清經解》本。

司馬遷著，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2000年。

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4、1995年。

——：《經學歷史》，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十三經注疏》本。

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呂大圭：《呂氏春秋或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呂祖謙：《左氏傳續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吳言生：《禪宗思想淵源》，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沈玉成等：《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二十四史》點校本。

孟軻著，趙岐注，焦循疏，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1996年。

- 季本：《春秋私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本。
- 林義正：《春秋公羊傳倫理思維與特質》，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年。
- 胡安國：《春秋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四部叢刊》初編本。
- 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13年1月。
- 姜炳璋：《讀左補義》，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同文堂藏版。
- 姜寶：《春秋事義全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紀昀主纂：《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柳詒徵：《國史要義》，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年。
- 孫希旦著，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 孫承澤：《春秋程傳補》，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
- 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山東文獻集成》本。
- 莊存與：《莊侍郎春秋正辭》，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年，《皇清經解》本。
- 莊周著，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
- 章學誠：《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1973年。
- ：《文史通義》，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年。
- 程頤、程顥：《二程全書》，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四部備要》本。
- 程端學：《春秋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程南洲：《賈逵之春秋左傳學及其對杜預注之影響》，臺北：文津出版社，1981年。
- 高攀龍：《春秋孔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張自超：《春秋宗朱辨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張高評：〈《春秋》書法之修辭觀〉，汪榮祖主編：《錢鍾書詩文叢說》，中壢：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1年7月，頁331-380。
- ：〈從屬辭比事論《公羊傳》弑君之書法——《春秋》書法之修辭觀〉，《東華漢學》第18期，2013年12月，頁135-188。
- ：〈比事屬辭與章學誠之《春秋》教：史學、敘事、古文辭與《春秋》書法〉，

《中山人文學報》第 36 期，2014 年 1 月，頁 31-58。

_____：〈即辭觀義與方苞《春秋直解》〉，高雄師大《經學研究集刊》第 16 期，2014 年 5 月，頁 1-34。

_____：〈因文取義與《春秋》筆削——方苞「言有序」之修辭詮釋〉，臺南大學《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第 48 卷第 2 期，2014 年 10 月，頁 1-32。

_____：〈比事屬辭與方苞論古文義法——以《文集》之讀史、序跋為核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0 期，2015 年 1 月，頁 225-260。

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本。

陸淳：《春秋集傳纂例》，臺北：大通書局，1970 年，《經苑》本。

陳亮：《春秋比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湛若水：《春秋正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董仲舒著，蘇輿注：《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 年。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2009 年。

葉夢得：《石林先生春秋傳》，臺北：大通書局，1970 年，《通志堂經解》本。

_____：《春秋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萬斯大：《學春秋隨筆》，臺北：復興書局，1961、1972 年，《皇清經解》本。

趙汭：《春秋屬辭》，臺北：大通書局，1970 年，《通志堂經解》本。

_____：《春秋師說》，臺北：大通書局，1970 年，《通志堂經解》本。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年。

趙鵬飛：《春秋經筌》，臺北：大通書局，1970 年，《通志堂經解》本。

熊十力：《讀經示要》，臺北：廣文書局，1970 年再版本。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裴汝識點校本：《王安石年譜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 年。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 年，《十三經注疏》本。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2001 年。

_____：《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 年。

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鍾文蒸：《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韓愈：《韓昌黎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

蘇洵著，曾棗莊、金成禮箋註：《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蘇轍：《春秋集解》，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經苑》本。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樂保群、呂宗力校點：《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顧棟高著，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安井衡：《左傳輯釋》，臺北：廣文書局，1967、1979年。

The Writing of *Chun Qiu* and its Denotation: A Discussion on the Inter-Comparisons for Truth-Meaning Versus Abandoning the Commentaries to Focus on the Classics

Chang, Kao-ping^{*}

[Abstract]

The core of *Chun Qiu* was to reflect on the thoughts and rhetoric of Confucius based on certain essential historical events. The most valuable component of this book is that in writing the book, Confucius placed particular emphasis on producing a text based on real events, so that the text that he wrote could vividly reflect and illustrate both the incidents he discussed as well as his teaching. Gu Yan-wu, the author of “*Ri Zhi Lu*”, in analyzing and commenting on the book stated that judgments were made within narration. In addition, Zhu Xi believed that *Chun Qiu* not only reflected the truth, but that there were also theories and lessons behind the text. One of the features of the book is the hidden message written between the lines. This “hidden message” was, in fact, the real message that Confucius tried to communicate to his readers, but it was one that could not be openly stated. This study was set up to analyze the writing skills of *Chun Qiu*: *Shu Ci Bi Shi* (historical comparison to appraise things).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examine the rhetorical methods employed in *Chun Qiu*: (1)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of more than one historical event; (2) link the relevant parts of the text to find the “true” meaning; (3) explore the complete text to reveal the “true” meaning.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all three ways, we may be able to abandon the commentaries and focus on the classics, and hence explore the hidden meaning of even a simple tex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space, I will only exemplify the first of the three rhetorical methods listed above.

Keywords: The writing of *Chun Qiu*, *Shu Ci Bi Shi* (historical comparison to appraise things),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abandoning the commentaries to focus on the classic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